

顧孟餘的政治生涯： 從挺汪、擁蔣到支持第三勢力

黃克武

摘要

在20世紀中國歷史上，顧孟餘曾叱吒風雲，不過今日卻沒沒無聞。他過世之時，陶希聖等人所寫的〈顧孟餘先生事略〉說他：「以博學深思之學人，獻身於三民主義國民革命，其言論文章從不曲學阿世，其政治行徑亦和而不同。」然詳情究竟為何？本文利用各種史料描述顧氏的一生經歷，著重於他與汪兆銘及蔣中正的互動，以及對國共鬥爭的態度，以一窺近代中國書生從政的曲折過程。顧氏的政治生涯可分為四個階段。一、挺汪精衛：從1924年加入中國國民黨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此時他是汪的首席智囊，參與國共合作、武漢分共、改組派與擴大會議，高舉反蔣的大旗。二、汪蔣合作：從九一八事變至1938年底汪發表豔電，在汪、蔣合作的格局之下，顧擔任鐵道部長，從事交通建設，支持剿共與抗日。三、擁蔣：從豔電至國共內戰、政府遷臺，顧反對汪之和平運動，1939年投入蔣中正陣營，曾擔任中央大學校長；行憲後被提名為行政院副院長、考試院長，然堅持未就，淡出政壇。四、支持第三勢力：1949年之後，他對國共兩黨均無信心，在李宗仁與美國情治單位的支持下，在香港與張發奎、張君勱等人從事第三勢力的政治運動。失敗後定居美國，依賴總統府資政的微薄薪資度日。1969年返臺，1972年過世。

關鍵字：顧孟餘、胡適、汪兆銘、蔣中正、第三勢力

The Political Career of Gu Mengyu: From Supporting Wang Jingwei to Backing Chiang Kai-shek to Joining the Third Force

Max K. W. Huang*

Abstract

Gu Mengyu (1889-1972) was both an important intellectual and a prominent politic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e was very famous from the 1920s to 1940s, but today few people knew even his name. When he died in 1972, Tao Xisheng and others wrote a brief biography on him, saying that “He was a learned and thoughtful person devoted himself to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of Dr. Sun Yatsen’s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He seemed never to have distorted his views to cater to popular tastes and always insisted on his own political choices.” Yet very few people knew the details of his life. This paper uses various related materials to describe Gu’s life, emphasizing his relationships with Wang Jingwei and Chiang Kai-shek in order to show some of the most complicated experience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last century. Gu’s political career can be in rough chronological order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First, from 1924 to 1931, he chose to support Wang Jingwei. During this period he was Wang’s principal advisor, participating i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uomind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Wuhan’s split with the communist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Clique’s criticism of Chiang Kai-shek. Second, from 1931 to 1938, the period of cooperation between Wang and Chiang, he served both as Minister of Railways and of Transportation. Third, from 1939 to 1949, he was opposed to Wang’s peace movement while favoring Chiang in his fight against the Japanese, by becoming for sometime the president of Zhongyang University (1941-43); furthermore, in 1948

*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Chiang appointed him Vice-President of the Executive Yuan, but he declined the offer. And fourth and the last, after 1949, he went to Hong Kong to join the “Third Force” led by Zhang Fakui and Zhang Junmai under the support of Li Zongren and America’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When the “Third Force” failed in mid-1950s, he moved first to California and then to Taiwan where he died in 1972.

Keywords: Gu Mengyu, Hu Shi, Wang Jingwei, Chiang Kai-shek, Third Force

顧孟餘的政治生涯： 從挺汪、擁蔣到支持第三勢力*

黃克武**

壹、前言

顧孟餘（1888-1972）早年留學德國，返國後任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教務長。他目睹國內混亂的局勢，1924（民國13）年在李大釗（1888-1927）的聯繫與蔡元培（1868-1940）、李石曾（1881-1973）的介紹下，加入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在國民黨內，顧成為汪兆銘（1883-1944）的首席智囊，曾參與聯俄容共、武漢分共、改組派與擴大會議，後擔任鐵道部長（1932-1934）、交通部長（1935-1937，未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1938，未就）等。在汪陣營之中，顧與陳公博（1892-1946）齊名，同為汪之重要幕僚，然在1938年12月底的艷電之後極力反對與日和談，而與汪、陳等分道揚鑣。1939年底在蔣中正（1887-1975）的邀約之下赴重慶，蔣任命他為中央大學校長（1941-1943），並支持他出任行憲後的行政院副院長、考試院長（1948，均未就）。1949年後，顧並未隨蔣赴臺，反而在香港與張發奎（1896-1980）、張君勱（1886-1969）等籌組第三勢力，其後

* 感謝政治大學劉季倫教授與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指正，又提供許多補充材料，使筆者得據以修改初稿，避免許多錯誤，謹致謝意。本文之完成得助於呂芳上館長所領導的事略稿本讀書會與連續多年所舉辦的兩岸學者「蔣中正研討會」，使筆者逐漸進入民國政治史研究的領域內，亦表謝忱。又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蔣介石、汪精衛與抗戰時期中國知識分子」部分研究成果，計畫編號：103-2410-H-001-039-MY2。

收稿日期：2015年6月24日；通過刊登日期：2015年9月15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赴美居住，1969 年在蔣的同意下返臺定居，3 年後落寞以終，病逝於榮民總醫院。在思想上，顧原為國民黨左派，在 1927 年分共之後，支持自由民主，堅決反共。顧曾於改組派與擴大會議時期與西山會議派及其他反蔣勢力結盟，然在九一八事變、國人共赴國難之後，他一直與蔣站在同一戰線。蔣在私底下對他抱怨頗多，不過對這一位他口中所稱的「孟餘同志」始終予以重用與支持。綜觀顧的一生，經歷了從聯共到反共、從主和到主戰、從挺汪、擁蔣到支持第三勢力的轉變，見證了 1949 年前後中國知識分子思想與態度的變化，以及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威的微妙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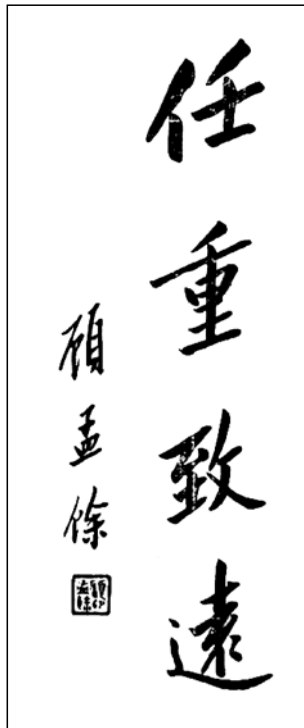


圖 1、顧孟餘墨蹟

資料來源：《交通雜誌》，第 1 卷第 6/7 期（1933 年），頁 1。

顧孟餘一生涉及民國史上許多重大事件，不過他所留下來的資料並不多。誠如《傳記文學》編者所言：「在中國現代史上，顧氏……是一個忽隱忽現、忽進

忽退的影子。有關顧氏之文獻與史料少而又少。顧氏雖居高位，卻難得出現在公眾之前，就職、離職，既不發表通電，也不公開演說，更從未印行言論集、演講集之類書籍，甚至其本人之墨蹟及照片流傳在外者也極罕見。」¹在史料之中只能找到少數他的墨蹟與照片（圖 1、2）。今日對一般人來說，他是一位沒沒無聞之人，即使對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而言，多數的人也不瞭解他的生平事蹟。這與顧孟餘「淡薄持身」的性格頗相符合。²



圖 2、顧孟餘與李大釗合照

資料來源：《良友畫報》，第 5 期（1926 年 6 月），頁 4。

對顧一生較全面敘述的文章是由陶希聖（1899-1988）執筆，經陶氏與谷正鼎（1903-1974）、李壽雍（1902-1984）、周德偉（1902-1986）等人共同商訂的〈顧孟餘先生事略〉一文，乃顧於 1972 年過世時的行狀。當時蔣中正尚在世，行狀中對於他與國民黨左派、汪兆銘的關係等均含糊帶過，且汪的名字並未出現，只說：「抗戰既發之後，更堅持民族大戰，摒棄奸偽組織，雖相從多年之友亦凜然

¹ 編者，〈關於顧孟餘先生及本社座談會的一些報告〉，《傳記文學》，第 29 卷第 1 期（1976 年 7 月），頁 30。

² 陶希聖，〈記顧孟餘先生〉，《傳記文學》，第 21 卷第 2 期（1972 年 8 月），頁 29。

不可干」；對於顧與蔣的衝突、恩怨、離合，與第三勢力等則完全不提，他被描寫成為一位畢生忠黨愛國、協助蔣中正反共大業的國民黨員。該文最後，陶、周等人以蓋棺論定之說法，強調顧孟餘「以博學深思之學人，獻身於三民主義國民革命，其言論文章從不曲學阿世，其政治行徑亦和而不同」。³ 然究竟如何「不曲學阿世」、「和而不同」，則不得其詳，其中似乎留下一些伏筆，頗耐人深思。此外，在《傳記文學》「每月人物專題座談會：顧孟餘」專號（1976）中，梅恕曾（1901-1982）、吳韜（1903-1990）、胡耐安（1899-1977）、凌鴻勛（1894-1981）等人有幾篇回憶文字。⁴ 再者，學術作品中有一、兩篇曾探討他擔任鐵道部長時所引發的彈劾案，而外文有關汪兆銘與國民黨左派的著作中曾簡單地提到顧的生平與思想；除此之外沒有太多有關顧孟餘的線索。⁵

最近十多年以來，因為一些新史料的出現，讓我們可以重新省視顧孟餘的一生。其中比較重要的史料有：《蔣介石日記》、《譚延闓日記》、《王世杰日記》、《陳克文日記》、周德偉回憶錄《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呂芳上主編）等。此外，近年來國史館開放的《汪兆銘史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朱家驊檔案》、《王世杰檔案》等，也提供一些重要的訊息。再者，上海圖書館的清末民初報刊資料庫、各種外文報紙資料庫，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典藏、開發的報紙資料庫，因具檢索功能，可以很容易地掌握期刊報紙之中與顧孟餘相關的報導。其中比較重要的是他在《北京大學日刊》、《北大社會科學季刊》、《前進》與《南華評論》等所寫的文章（顧氏的著作目錄請參見本文附錄）。本文即利用這些

³ 國史館編，〈顧孟餘先生事略〉，《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17輯（臺北：國史館，1998年），頁564-567。

⁴ 梅恕曾，〈7月號人物專題座談會：顧孟餘（兆雄）〉，《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1976年7月），頁6-30。

⁵ 如劉云虹，〈從顧孟餘案看監察院的彈劾制度〉，《民國檔案》，2010年第4期（2010年12月），頁80-85；段智峰，〈蔣汪合作格局下的另一種局面——以1934年顧案為中心〉，《民國檔案》，2011年第1期（2011年4月），頁103-110；Gerald E. Bunker, *The Peace Conspiracy: Wang Jing-wei and the China War, 1937-194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119, 147；Wai-chor So, *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1924-1931*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山田辰雄，〈中国国民党左派の研究〉（東京：慶応通信，1980年）。

史料敘述顧孟餘的一生，探討他如何從政，如何在國共鬥爭與中日交戰的背景下來與汪兆銘、蔣中正互動，而影響他一生的際遇。

貳、顧孟餘的早年生涯(1888-1924)

顧孟餘原名兆熊，字夢漁、夢餘，後改名孟餘。原籍浙江上虞縣西華村，寄籍河北宛平，1888（光緒14）年10月18日生於北京，1972年6月25日卒於臺北，享年84歲。他自幼聰穎，1905年入北京譯學館就讀，翌年出洋留學，入德國萊比錫大學習電機工程，因興趣不合，轉至柏林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他頗有語言天才，英、德、法語俱佳。⁶在個性上，顧深沈內斂而多謀，有人形容他是一位「天下獨一無二之深謀遠慮之人」、⁷「為人沈默寡言，從不自矜其學以驕人，與語十問不一答，即答亦唯唯而已，不著邊際，豈所謂深藏若虛者耶」、⁸「他說話不多而要言不繁，面無笑容頭腦冷靜」；⁹缺點是因多慮而畏縮，「慮事太深，不免畏葸」。¹⁰留歐期間，因認同孫中山（1866-1925）之革命理念，加入中國革命同盟會，辛亥革命時曾短暫回國。1912年與同是留德的「時髦女性」韋增瑛女士結婚，由蔡元培證婚。¹¹韋女士對顧一生照顧備至，被譽為「賢內助」。¹²

1913年，國民黨討伐袁世凱（1859-1916），爆發二次革命，顧孟餘回國參加討袁大業。1914年，德國西門子公司聘其為工程師，遷居北京，「為西門子電廠整理機械，兼改善工廠管理法，使西門子廠營業，得以蒸蒸日上」。¹³1916年12

⁶ 「當民國八、九年……杜威、羅素來華，有一次北大第三院馬神廟大廳授學位大典是由顧先生，他發表一篇講詞，除了中文外立即譯為英語，及法語，聽得我們瞠目結舌。」梅恕曾，〈顧孟餘先生的生平與往事〉，《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1976年7月），頁7。

⁷ 望塵生，〈顧孟餘之錦囊〉，《社會日報》，上海，1931年5月27日，版2。

⁸ 汲惺，〈顧孟餘悄然去國〉，《天文臺半週評論》，香港，1937年3月17日，頁4。

⁹ 胡耐安，〈我所認識的顧先生〉，《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1976年7月），頁21。

¹⁰ 《譚延闓日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1927年5月9日。

¹¹ 國史館編，〈顧孟餘先生事略〉，《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17輯，頁567；胡美琦，〈紀念顧孟餘夫人〉，《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1976年7月），頁29。

¹² 顰顰，〈顧孟餘之賢內助〉，《福爾摩斯》，上海，1933年6月11日。

¹³ 顰顰，〈顧孟餘之賢內助〉。

月，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聘顧孟餘至北大任教。蔡與顧淵源極深。顧是蔡元培任職於清末譯學館時的學生；¹⁴ 又與蔡同樣留學德國的萊比錫與柏林大學。到北大之後，顧同時擔任文科德文系主任及法科經濟系主任等職，「先生汲取奧地利心理學派之菁華，並採取德國麥克斯威爾博與佛蘭茲奧本海末爾之社會歷史學方法，剖析經濟結構」。¹⁵ 他的學生周德偉說：「顧先生不是一個雄辯家，但授課條理井然，他雖有講義，……但指定應習參考書不少，包括孟格爾（Carl Menger, 1840-1921）、耶芬斯（Stanley Jevons, 1835-1882）的《經濟學原理》，並勸學生，如外文程度不佳，可讀嚴譯《原富》。」在德語教學方面，顧編有《德意志科學論文選讀》，「顧先生於每一篇之末寫一作者簡歷及學說提要」，對學生幫助很大。¹⁶

1917 年北大開學那一天，校長蔡元培主持開學典禮，介紹新聘諸教授。當天在場者除了顧孟餘外，還有胡適（1891-1962）、陶孟和（1887-1960）、王星拱（1887-1949）、何炳松（1890-1946）、陳大齊（1886-1983）、朱家驊（1893-1963）等人。¹⁷ 當時北大教授中與顧孟餘齊名者，首推 1917 年自美返國、至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的胡適，然而顧孟餘與胡適之個性與志趣並不相同。顧、胡兩人較密切的接觸大約是從 1919 年初開始，因同為文科教授，共同參與一些學術界重要的討論。該年 3 月，北大與燕京大學因宗教問題在西山臥佛寺開談話會，胡適記載：「北大方面到的有蔡元培先生、李大釗先生、陶孟和先生、顧孟餘先生和我；基督教徒到了二三十人。上午的會上，雙方各說明他們在思想上和宗教信仰上的立場；下午的會上討論的是『立場雖然不同，我們還能合作嗎』？結論是我們還可以在許多社會事業上充分合作。」¹⁸

除了學術議題之討論外，顧、胡之間因學校行政與學生事務等方面的工作有

¹⁴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臺北：遠流出版社，2011 年），頁 166。

¹⁵ 陶希聖，〈記顧孟餘先生〉，《傳記文學》，第 21 卷第 2 期（1972 年 8 月），頁 29。這兩位德國學者指 Max Weber（1864-1920）與 Frank Oppenheimer（1912-1985）。

¹⁶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 138。

¹⁷ 胡頌平編，《朱家驊年譜》（臺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69 年），頁 9。

¹⁸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 2 冊（臺北：國史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14 年），頁 348。

不少共事的機會。如 1920 年 12 月之後北京政府有好幾個月發不出高校與中學教職員的薪水。1921 年 3 月起，各校出現教師罷教、學生罷課。¹⁹ 同年 1-9 月，校長蔡元培在多事之秋出國考察，²⁰ 由顧孟餘與胡適共同協助北大就此事與其他大學商討改進對策。9 月，顧孟餘再度當選教務長，他力辭連任，想要請胡適接手，但胡適不願意。²¹ 10 月 11 日，北大開學，在典禮上蔡元培邀請胡適致詞，他說了 30 分鐘，主旨在如何提高大學生的程度，並希望學生「宜有決心，以後不可再罷課了」。²² 說完之後，胡適似乎覺得不妥，又說：「說的話，也有不應該我說的。有許多話應該是子民先生或孟餘先生說的。但我起立時，學生即大鼓掌歡迎；我上臺，他們又鼓掌。他們這種好意，我只能用老實話報答他。」²³ 由此可見，當時學校的行政領導雖是蔡元培、顧孟餘等人，然在學生心目中胡適非常受到歡迎，地位不比兩人來得低。不久，顧孟餘辭去教務長，1922 年 4 月由胡適當選教務長，4 月底上任。²⁴

在 1923-1924 年間，北京學潮不斷。其中一個起因是教育總長彭允彝（1878-1943）干涉財政總長羅文幹（1888-1941）的司法案件，使北大校長蔡元培憤而辭職出京（1923 年 1 月）；²⁵ 彭又發布「大學條例」（1924 年 2 月 23 日），要求各大學設校董會。「學界方面見部派校董中難以失意官僚、無聊政客，又明白了『大學條例』的背後的黑暗勢力與黨派利用，頗表示不滿」，因而群起抵抗，反對政治干涉教育。北大由評議會選出王星拱、陳大齊、顧孟餘等專任研究，在 3 月 9 日發表宣言，表示「北京大學全體教授反對教育部所頒國立大學條例，不承

¹⁹ 江勇振，《捨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 年），頁 112-116。

²⁰ 參見〈二十日歡迎蔡校長大會顧孟餘先生之歡迎詞〉、〈蔡校長演說詞〉，《北京大學日刊》，第 847 期（1921 年 9 月 22 日），頁 1；蔡元培表示：「兄弟這次出去，差不多九個多月。這中間學校裏出了許多想不到的事情，我在外邊，不能同諸位一樣的盡責任，諸位偏勞了。」

²¹ 胡適著，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集》，第 3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 年），1921 年 9 月 23 日，頁 321。

²² 胡適著，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集》，第 3 冊，1921 年 10 月 11 日，頁 374。

²³ 胡適著，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集》，第 3 冊，1921 年 10 月 11 日，頁 375。

²⁴ 胡適著，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集》，第 3 冊，1922 年 4 月 25 日，頁 537；1922 年 4 月 29 日，頁 549。

²⁵ 〈蔡元培辭職後之宣言〉，《東方雜誌》，第 20 卷第 1 號（1923 年 4 月），頁 145-147。

認國立學校有設置校董之必要」。²⁶ 1924 年 4 月 25 日，教務長再度改選，顧孟餘以 8 票當選，而王星拱、胡適、王世杰(1891-1981)等人都只得到 1 票。²⁷

除了校務之外，顧與胡在校外活動方面也有一些合作的機會。1922 年 5 月胡適在《努力週報》第 2 期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²⁸ 旨在建立憲政、公開、有計畫的好人政府，以保障個人自由與個性發展。此事源於研究系的林長民(1876-1925)與具學者背景之北洋政府官員王寵惠(1881-1958)、羅文幹等人約蔡元培等人「組織一種研究政治社會的團體」、「發表對於現今各種大問題之意見」，²⁹ 以解決裁兵理財、軍閥混戰(直奉戰爭)的亂象。這一件事涉及北大教授與研究系之間的關係。1920 年代初期，以梁啟超(1873-1929)為首的研究系想要聯合南北，建立全國的政治網絡，他一方面聯絡江蘇省教育會與東南大學，另一方面也與北洋故舊(如王寵惠、羅文幹等)、國民黨人聯繫。此外，梁啟超有出掌北大之企圖，因此北大教授也是研究系想要爭取合作的對象。³⁰ 1922 年 4 月底，胡、蔡兩人就與研究系合作一事有所討論，蔡元培表示擔心此舉會受到研究系之操縱，「發言將不足取信」。³¹ 胡適在考慮了蔡元培的意見後決定主動參與。他於 5 月 11 日寫了〈我們的政治主張〉，完稿之後打電話給李大釗，隔日約了幾位好友在蔡宅開會。這一天來開會並連署胡適之文章者計 16 人，包括「蔡元培、林長民、高魯、蔣百里、王寵惠、葉景莘、陳繹、王星拱、顧維鈞、顧夢

²⁶ 朔一，〈大學條例又引起了學潮〉，《東方雜誌》，第 21 卷第 7 號(1924 年)，頁 5-8；〈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 21 卷第 7 號(1924 年 4 月)，頁 156。

²⁷ 〈本校布告〉，《北京大學日刊》，第 1457 期(1924 年 4 月 29 日)，頁 1。

²⁸ 相關背景之分析請參見潘光哲，〈胡適與《努力週報》的創辦〉，收入李金銓編，《自由的理解與實踐——民國時期知識分子與報刊》(臺北：政大出版社，2008 年)，頁 81-108；潘光哲，〈〈我們的政治主張〉及其紛爭：1920 年代中國「論述社群」交涉互競的個案研究〉，收入李金銓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147-188。

²⁹ 胡適著，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集》，第 3 冊，1922 年 4 月 22 日，頁 529。

³⁰ 當時兩派之間的關係有分有合，例如胡適對梁啟超「機會主義」的作風不滿，且認為梁一生所犯的錯誤在於出任北洋政府官職。不過兩人對聯省自治運動的意見倒是十分接近。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 年)，頁 207-208；有關研究系聯絡南北之政治活動，以及梁啟超對北大校長的興趣，參見丘文豪，〈梁啟超的政治面向〉(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頁 40-61。

³¹ 胡適著，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集》，第 3 冊，1922 年 4 月 22 日，頁 530。

漁、胡適、李煜瀛、張祖訓、王建祖」。後來因故，簽署人數有所出入，據胡適表示「下午，孟餘自行取消，加入一涵、慰慈，共十六人」。這一個宣言於兩天之後在《努力週報》第2期刊出。出版之時署名者計有16人，他們的名字與頭銜依序是：

蔡元培	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王寵惠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羅文幹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湯爾和	醫學博士
陶知行	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	國立東南大學政法經濟科主任
梁漱溟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李大釗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
陶孟和	國立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
朱經農	國立北京大學教授
張慰慈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高一涵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徐寶璜	國立北京大學教授
王 徵	美國新銀行團秘書
丁文江	前地質調查所所長
胡 適	國立北京大學教務長 ³²

如果比對前後兩份名單，可以發現除了顧孟餘是自行退出之外，另外被排除掉的簽署者還有研究系的林長民與蔣百里（1882-1938），剩下的人幾乎都與北大有關。這很可能是蔡元培的主張，凸顯該宣言與學者之關係，並與研究系有所區隔。宣言發出之後，梁啟超與林長民對此很不滿意，認為胡適與蔡元培「有意排擠他們研究系的人」，並調侃胡適他們說：「我們不怪他，他是個處女，不同意同我們做過妓女的人往來。」³³

無論如何，顧孟餘的主動退出是一件值得玩味之事。顧的性格深沈內斂而多

³² 胡適著，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426。

³³ 胡適著，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2年5月14日，頁570。

慮，圖謀未來在政治上有所發展應是一個重要的原因。³⁴再者，思想上的差異不容忽略，周德偉說：「北大校長蔡元培、教授胡適等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力倡『好人政府』（此語為胡適所創，好人而無法治豈足為政哉，可見胡之幼稚），王寵惠、羅文幹、湯爾和亦署名。顧孟餘不同意人治之說，不允署名。」³⁵

此外，這可能也涉及北大之內「法日派」與「英美派」的派系之爭。顧孟餘在北大與蔡元培及李石曾的交情都很好，顧、蔡之情誼上文曾述及，所以顧多次出任教務長並代理校長。此外，蔡元培很依賴李石曾與北京政府交涉經費。³⁶李石曾與顧也有很深的交情。顧的祖父與李石曾的父親李鴻藻（1820-1897）為同科進士，故他自幼即與李熟識。³⁷看在胡適等人的眼中，這些人是「陰險下流」的「法國文化派」，「此輩者，李石曾、顧孟餘、沈尹默也」。³⁸他們「結黨把持，傾軋夢麟的情形，聞之一歎。夢麟方倚此輩為心腹朋友呢！」³⁹後來在 1925 年女師大風潮與北大脫離教育部事件，⁴⁰雙方人馬在北大的評議會開會，胡適與李石曾、顧孟餘、馬裕藻（1878-1945）等人的意見也是針鋒相對，分屬不同陣營，多年之後，胡適仍記得此事。⁴¹

³⁴ 陳正茂認為顧的退出是因為「多慮」。陳正茂，〈從擁汪到投蔣的顧孟餘〉，收入陳正茂，《逝去的虹影：現代人物述評》（臺北：秀威資訊，2011 年），頁 179-193。1922 年 9 月 22 日，當王寵惠的「好人內閣」發表後，胡適、顧維鈞等人熱烈激辯，顧孟餘也是「始終不肯開口」。胡適著，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集》，第 3 冊，1922 年 9 月 22 日，頁 808-809。

³⁵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 126。

³⁶ 周德偉表示當時北大教授月俸 280 元，只有李石曾支領月俸 360 元，而且不教課，「蓋石曾乃前清宰相之子，與北〔洋〕政府之官僚多世交，北〔洋〕政府常欠發教育經費，蔡每請李交涉經費，李至財政總長或次長之官邸，臥在鴉片煙床上，與之閒談，不費絲毫之力即取得柒萬玖千元之支票（當時北大之每月的經費數目）。蔡乃極有手段之人也」。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 171。

³⁷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 166、171。

³⁸ 沈尹默（1883-1971）早年留日，為書法家與詩人、北大文學教授，也是《新青年》雜誌的編輯之一，新詩作品多發表於《新青年》。

³⁹ 胡適著，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集》，第 4 冊，1925 年 1 月 17 日，頁 297-298。

⁴⁰ 胡適，〈這回為本校脫離教育部事抗議的始末〉，《胡適全集》，第 20 卷，頁 119-126；邵建，《瞧，這人：日記、書信、年譜中的胡適（1891-1927）》（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332。

⁴¹ 胡適在 1931 年曾回憶此一爭議，「北大評議會。我自從十四年秋天出席評議會與教務會議聯合會議和李石曾、顧孟餘等爭論之後，至今將六年。……會所即是六年前吵架的會

顧孟餘早年最重要的經歷是從出國留學到返回北大任教，並受到蔡元培的重用，與胡適等人齊名，是一位以教育、學術研究為專業的新式知識分子。⁴² 1924年時，他的生活出現一個重要轉折，孫中山逝世之後他加入了國民黨，開始走向書生從政的路。行狀記載「先生素為冷靜沉潛之學者，至此轉為慷慨激昂之戰士。」⁴³

叁、九一八事變前顧孟餘的政治參與（1924-1931）

1924年孫中山北上，「北方的學生群眾掀起了對中山的熱烈信仰」。⁴⁴ 這時汪兆銘也因孫中山生病，代其四處演講，因汪的宣傳詞鋒工巧，贏得青年的同情與愛戴，「故將三民主義帶到北方，精衛是無可爭議的首功」。⁴⁵ 國民黨內不少人看好汪兆銘日後將擔當重任，如譚延闓（1880-1930）就說：「汪……演說，語沉摯動人，孫先生後必以此子為巨擘矣。」⁴⁶ 顧孟餘也多次參與汪兆銘的演說。⁴⁷ 在孫中山生前，李大釗即向孫推薦顧孟餘，顧亦表示有入黨意願，而得到孫的認可。⁴⁸ 孫中山死後，顧孟餘加入國民黨，成為汪身邊的一位重要幕僚。1924年3

議室」。胡適著，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集》，第6冊，1931年3月26日，頁535；江勇振，《捨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頁122-126。

⁴² 經濟學家高廷梓（1895-1984）談到蔡元培在北大新舊學者兼容並蓄之時，即舉胡適與顧孟餘為新派學者之代表：「先生的博大淵深一般人是不会容易领略的。例如他延聘辜鴻銘任教授，同时又聘請胡適、顧孟餘、杜威、羅素諸先生講學，是一件不平凡的事。過去北大能成功為全國最高學府，實在是先生的宏大的精神所創造。」見高廷梓，〈悼吾師蔡子民先生〉，《東方雜誌》，第37卷第8號（1940年4月），頁64。

⁴³ 〈顧孟餘先生事略〉，收入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17輯，頁565。

⁴⁴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163。

⁴⁵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163。

⁴⁶ 《譚延闓日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1925年9月27日。

⁴⁷ 如1925年3月1日，在北大三院大禮堂召開全國國民會議促成會總會之成立大會。由汪兆銘與徐謙演講，顧孟餘擔任大會主席。「演詞甚淋漓盡致。聽者頗動容。蕭〔按：指蕭人鵠〕演畢。眾皆起立高唱國民革命歌，奏軍樂，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等口號後，遂攝影而散」。〈全國國民會議促成會成立〉，《大公報》，天津，1925年3月2日，版4。

⁴⁸ 「顧與陳獨秀情感不洽，與李大釗則頗要好。……適國父北上，顧乃要求李大釗先在國父

月顧在蔡元培和李石曾的介紹下入黨：「蔡元培等觀察形勢，知汪精衛將來不論居何名義，總是孫先生最適宜的繼任人選，但汪太感情化，容易衝動，考慮事理欠周密，想覓一位深沉冷靜的人物輔佐他。最後選定顧孟餘，由蔡元培、李石曾介紹入黨。……蔡李介紹顧於汪，態度極為嚴肅，請汪遇事與顧商酌，故顧一入汪幕，即猶諸葛亮之於劉備。」此後他成為「汪之靈魂也」！⁴⁹

顧加入國民黨之後成為汪的臺柱。他清楚瞭解蔣、汪之差異，汪是書生、蔣是軍人；顧認為汪較易受「操縱」（或說受他影響），而「蔣非可運用之人，且其親信如吳稚暉、張靜江等已為老朽，陳果夫本綢緞店經理，毫無知識，羞與為伍」。⁵⁰ 顧一生都被歸類為汪派人物、改組派大將，後來即使投入蔣的陣營，仍被視為外人，始終未能進入蔣的核心班底。

顧在入黨之後積極參與政治活動。1925 年初的善後會議，在當時是一個重要的事件，是北京政變之後段祺瑞（1865-1936）以「解決時局糾紛，議籌建設方案」為宗旨的一個會議，以回應孫中山召開國民會議之提議。顧孟餘、胡適兩人對此有不同的看法。⁵¹ 簡單來說，胡適的參與乃延續他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

面前打一個招呼，……顧的加入國民黨……得到國父之認可」。萱，〈顧孟餘的籍貫與學歷之謎〉，《文飯》，第 18 期（1946 年 8 月），頁 4；程思遠表示張國燾告訴他：「顧孟餘是李大釗一九二五年初向孫中山薦賢名單中的第一名。」程思遠，《政壇秘辛》（香港：南粵出版社，1986 年），頁 235-236。范予遂曾問邵力子誰是顧孟餘入黨之介紹人，邵回答說：「或係〔係〕李大釗先生介紹。」范又表示：「當時的高級知識分子贊成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而參加國民黨得〔的〕是極少數，顧孟餘以李大釗的影響而加入國共合作的國民黨，是很可能的。」范予遂，〈我所知道的顧孟餘〉，收入中國人民及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政人物下》，第 20 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年），頁 473。

⁴⁹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 166、337。蔡元培等人對汪的觀察與周佛海相同，周說：「汪之短處，一在猶豫，一在衝動，而其長處則在頗能納言。」周佛海著，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全編》，上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 年），1938 年 12 月 1 日，頁 203。

⁵⁰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 198。

⁵¹ 有關胡適參與善後會議的前因後果及其反應，見邵建，《瞧，這人：日記、書信、年譜中的胡適（1891-1927）》，頁 273-279。

此稍接近；二為不願學時髦人談國民會議；三為看不過一般人的輕薄論調」。⁵²不過胡適參與善後會議（以及為清室辯護）等事的確造成其聲望大跌，⁵³有人罵他是「賣身於段賊」；此後胡適與青年學生的關係開始逐漸疏遠。⁵⁴2月18日會議召開之中，胡適對於段祺瑞未能停止國內軍事行動感到失望，撰寫了〈退出善後會議〉一文。⁵⁵3月6日《晨報》刊出胡適辭職的消息，「認為在戰爭狀態之下無從善後」。⁵⁶

顧孟餘則採取不同的因應方式。根據周德偉的敘述：「段亦注意到北大的教授，最享盛名的是胡適之、顧孟餘，乃聘二人參加善後會議，結果胡適之參加了。顧孟餘眼光銳利，且素有政治抱負，平日不露聲色而已。彼於接到聘書後，立即退還並在北京《晨報》登出一啟事，有『孟餘決不入此豬圈』之語。顧孟餘向不動怒，但此次忍不住了。此是他一生最激烈之言，此語得罪了不少所謂名流，尤其傷了胡適之。……從此胡顧之間相處甚不愉快，直到兩人之死未恢復交情！」⁵⁷但周德偉的記憶略有出入，此則「顧孟餘啟事」乃登載於1925年2月23日的《京報》，原文是：「孟餘無似，未至化豚，豈能伴公等入豕牢耶？」胡適當時看到這則報導，剪下此一啟事保留在他的檔案之中，並加上「顧孟餘的清高」為標題（圖3）。⁵⁸無論如何，此後顧、胡兩位北大教授都離開善後會議，分別被歸入汪、蔣陣營，在政治上各有發展。

⁵² 胡適著，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集》，第4冊，1925年1月17日，頁297。

⁵³ 周德偉提到當時他看到胡適「稱溥儀為皇上」、「陳炯明之行動乃革命行動」、「出版紅樓夢考證，……費大力研究死問題，真是玩物喪志」，「如是胡先生在余心中價值表上，一落千丈」，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135。

⁵⁴ 邵建，《瞧，這人：日記、書信、年譜中的胡適（1891-1927）》，頁275。

⁵⁵ 胡適著，季羨林編，《胡適全集》，第21卷，頁325-326。

⁵⁶ 〈胡適辭善後會議會員〉，《晨報》，北京，1925年3月6日，版2。根據該文「胡適此次加入善後會議，本出自嘗試態度，所謂嘗試者，即察看善後會議是否有作為之可能性，如各方確有誠意解決糾紛，便在會中奮鬥，否則即行辭職」。

⁵⁷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164。

⁵⁸ 「剪報：顧孟餘的清高」（1925年2月23日），〈北京檔〉，《胡適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藏，館藏號：HS-JDSHSC-0267-049。顧孟餘登報是因為看到他列名善後會議中「教育專門委員名單」，因而「不勝詫異」。該名單參見善後會議秘書廳編，《善後會議公報》，第3期（1925年2月），「附錄」，頁10；《大公報》也刊出此一名單，〈續誌專門委員會要訊〉，《大公報》，天津，1925年2月23日，版4。



圖 3、顧孟餘的清高影像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藏。

顧、胡之分歧還涉及對群眾運動的不同態度，胡適一直不鼓勵學生罷課與學潮，顧則較支持此類活動。善後會議之後，顧仍對段政府有所不滿，這時他已加入國民黨，積極參與群眾運動。1925 年 6 月 30 日，北京召開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國民大會，到會者十餘萬人，德意志、朝鮮、土耳其、印度諸國均有代表出席，顧孟餘擔任中央壇之主席，邀約國際勞工聯合會代表林哈德等人演講，此次會議延續到 7 月中旬。⁵⁹ 1925 年 11 月 28 日北京發動示威運動，要求段氏下野，「北京工人學生舉行國民革命大示威運動，北京大學教授朱家驊、顧孟餘等指揮，包圍段祺瑞宅，要求段氏下野，組織國民政府，大眾搗毀章士釗、李思浩、梁鴻志、朱深、曾毓雋住宅」。⁶⁰ 接著，1926 年發生三一八事件，馮玉祥

⁵⁹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 1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 年），頁 901；〈北京之國民大會〉，《圖畫時報》，第 258 號（1925 年 7 月），頁 7；〈天安門之國民大會〉，《申報》，上海，1925 年 7 月 21 日，版 6。

⁶⁰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 1 冊，頁 950。

(1882-1948)國民軍與奉軍作戰期間，大沽口守軍砲擊日本軍艦，日本等國認為違反「辛丑和約」，對北洋政府提出抗議。由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北京分會及北京市黨部在北京發動群眾運動，進入天安門抗議，要求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1926年三一八的抗議大會由徐謙(1873-1940)、顧孟餘、李大釗等主持，並發表宣言。此次集會遭到鎮壓，有40餘人身亡、150餘人受傷。慘案之後，「段祺瑞及北京國務院通電謂本日慘案乃徐謙等鼓動所致，令通緝徐及李大釗、李煜瀛(石曾)、易培基、顧兆熊(孟餘)五人」，其罪名是「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率暴徒闖襲國務院」。⁶¹1926年3月20日《申報》對此有詳細報導：

政府認徐謙、李大釗、李石曾、易培基、顧孟餘五名為國務院前大慘劇之首謀者。已於十九日下逮捕令，其內容略謂：徐謙等五名，藉名共產學說，屢釀事端，此次徐謙以共產黨執行委員之名義，散佈宣傳傳單，率暴徒數百名襲國務院、灌火油、投炸彈、用棍棒毆打軍警，軍警出於正當防衛，其結果致雙方皆有死傷。如此行為，幾無國法，深堪痛恨。今已暴露該暴徒等曾潛赴各地方，屢謀不軌，國家之秩序，將瀕於危機，除京師令軍警盡力防範外，著各地方長官一律嚴重取締，以滅禍機。徐謙等五名不問在北京內外，概行逮捕，依法處罰。⁶²

由此可見，顧入黨之後與群眾運動之密切關係。當顧孟餘在籌劃、參與包圍段宅與三一八事件之時，胡適一直置身事外，他從1925年8月底啟程南下，到武漢演講，又到上海割痔瘡。到1926年5月才回北京，7月他又去歐洲開會，再去美國訪問。1927年5月才回到上海。⁶³

在思想傾向上，顧、胡也有所不同。胡適一直堅持自由、民主。顧則是一位三民主義的支持者，兩者雖有重疊，卻不盡相同。1920年代初期，顧孟餘在北大教授經濟學原理、貨幣與信用等課，重視學理，並擔任北方學生所組織的團

⁶¹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2冊，頁28。三一八事件之後顧南下廣州，先任廣東大學校長，之後辭職，10月改任中山大學副委員長。范予遂，〈我所知道的顧孟餘〉，頁473。

⁶² 〈北京軍警槍殺請願團之慘劇〉，《申報》，上海，1926年3月20日，版6。

⁶³ 江勇振，《捨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頁130。

體三民主義實踐社的指導老師。⁶⁴此外，顧也參加有關馬克斯思想的演講，1922年5月5日「北京大學馬克斯學說研究會舉行馬克斯誕生百又四週年紀念，李大釗、顧孟餘、陳啟修、高一涵講演」。⁶⁵在學理上，顧當時是少數懂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人。⁶⁶

1925-1926年國民黨在北方的黨務由在北京成立的政治分會負責，該會之委員有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暉(1865-1953)、于右任(1879-1964)、丁惟汾(1874-1954)、李大釗、于樹德(1894-1982)等人(李與于為共產黨員)。顧孟餘因汪兆銘的介紹，成為分會委員，負責黨務與對外宣傳文件的草擬。對於顧的表現，于右任並不滿意。他不喜顧之文字，常予批評。顧自尊極強，認為是侮辱，因而與于右任發生衝突，甚至不願一起開會。後來顧任鐵道部長時于右任對他的彈劾案可能部分肇因於此。⁶⁷

顧在國民黨內具有正式的地位是在1926年1月廣州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因李大釗、于樹德的極力推薦，⁶⁸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該次選舉共發出253張選票，顧孟餘得到222票，排名第十三。⁶⁹5月15-22日的二屆二中全會通過「整理黨務案」，將中共黨員排出核心之外；5月20日顧與張靜江(1877-1950)、蔣中正、譚延闓、吳稚暉共同出任國共兩黨聯席會議之代表。⁷⁰同時，顧孟餘接替毛澤東(1893-1976)擔任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6月7日就任，由何香凝(1878-1972)、甘乃光(1897-1956)、譚延闓、鄧演達(1895-1931)、顧孟餘5人

⁶⁴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167。

⁶⁵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1冊，頁638。

⁶⁶ 1926年胡漢民曾說：「關於馬克斯主義，我懂得少，顧孟餘懂得多」，他並建議將赴俄國留學的白瑜向顧請教馬克斯主義。顧建議白瑜讀兩本書，「一本是《通俗馬克斯》(People's Karl Marx)、另一本是《列寧死後的俄國》(Russia Since Lenin Died)」。白瑜，〈出身世家而愛惜羽毛的顧先生〉，《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1976年7月)，頁16。

⁶⁷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170。

⁶⁸ 萱，〈顧孟餘的籍貫與學歷之謎〉，《文飯》，第183期(1946年8月)，頁4。有關李大釗、于樹德在國民黨一大之後受孫中山支持，推動國共合作，參見李戡，《國民黨員毛澤東》(臺北：李敖出版社，2014年)，頁333-340。

⁶⁹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373。

⁷⁰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23卷第13號(1926年7月)，頁137。

擔任該部委員，⁷¹「此後顧代汪在黨內採取主動行動」。⁷²在 1925-1927 年間，他的思想和汪兆銘類似，是左傾的，與甘乃光（1897-1956）、陳公博並列為「左派三傑」。⁷³不過顧在 1926 年 8 月 17 日第一次與俄人維經斯基（Grigori Naumovich Voitinsky, 1893-1956）會談時，對於「國民黨過於布爾什維化了」深感憂慮，他說部分的左派黨人甚至比共產黨員還激烈。例如汪總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論述一切」，亦即「把一切都建立在開展階級鬥爭上」。對顧孟餘而言，「不能持有階級的觀點」，而應號召各個階級參與國民革命。顧對於蔣中正也有不滿，他說：我們「很難指望和期待蔣介石向左轉。很可能他會進一步右轉。蔣介石在廣大居民和國民黨眼裡已名譽掃地。這不是因為他對北伐作了軍閥式的闡釋，而是因為他妄圖把全部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⁷⁴1926 年 8 月 31 日，顧孟餘在與維經斯基第二次會談時，明白表示希望國民黨左派能與共產黨合作，「結成聯盟」，同時允許國民黨「在工農群眾中進行工作」。⁷⁵不過雙方似乎未能達成共識。

1926 年底之後，顧參與了與汪兆銘密切相關的武漢分共、改組派、擴大會議等事件。

⁷¹ 毛澤東在 1926 年 5 月 25 日辭去代理宣傳部長，後由顧接任。顧在 1926 年 10 月 2 日的中常會曾請辭代理宣傳部長，會議決定予以慰留。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冊，頁 566；《中國國民黨中執委常務委員第 33 次會議記錄》，上冊，頁 582-583；《中國國民黨中執委常務委員第 36 次會議記錄》，下冊，頁 689；《中國國民黨中執委常務委員第 62 次會議記錄》；亦參考李戡，《國民黨員毛澤東》，頁 387、322-323。

⁷²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 175。

⁷³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45》，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年），頁 1329。

⁷⁴ 〈維經斯基同顧孟餘談話記錄〉（1926 年 8 月 17 日於廣州），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第 3 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年），頁 398-401。維經斯基的中文名為吳廷康，是共產國際創立初期有影響的人物，也是中共初創時期經費的實際提供者。其生平事蹟可參考周利生，《吳廷康與中國大革命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

⁷⁵ 〈維經斯基同顧孟餘談話記錄〉（1926 年 8 月 31 日於廣州），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第 3 卷，頁 422-424。

一、武漢分共

1926 年 3 月 20 日中山艦事件後，汪被迫出走法國。10 月 18 日國民黨在廣州召開聯席會議通過迎汪返國案，「推何香凝等四人為迎汪代表，顧孟餘起草迎汪電稿，蔣介石亦有電勸汪返粵」。⁷⁶ 1926 年底國民政府決定遷都武漢。次年 1 月 3 日中央政治會議在南昌行營就駐在地應為武漢還是南昌進行討論，出現以蔣中正為首的南昌陣營與以鮑羅廷（Boradin Mikhail Markovich, 1884-1951）、徐謙為核心的武漢陣營間的權力鬥爭。⁷⁷ 顧對於此事的態度有些搖擺不定，他一方面與張靜江一樣支持蔣設於南昌的提案，⁷⁸ 另一方面似乎也傾向陳公博、孫科（1891-1973）與宋子文（1894-1971）等遷都武漢的看法，認為：「唯有國府遷漢，黨才免得分裂。」⁷⁹ 1927 年 1 月 4 日蔣在日記中記載：「憂患以今日為甚，逼迫振憾，而決議之後，決無成敗利鈍之可慮。只有負責遠行而已。上午顧孟餘同志幾為動搖。子文且以財政無法相要脅。辦事困苦莫甚於經濟相逼也。」⁸⁰ 這時蔣希望藉著顧的力量促成黨內合作，於是親訪顧，「請其赴武漢說服譚延闓等將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遷南昌，擺脫共產黨之干擾」。⁸¹ 1 月 11 日顧以國民黨宣傳部長的身分隨蔣從南昌出發赴武漢，13 日抵達，商討遷移問題。⁸² 對蔣來說，遷至南昌的主因是為了擺脫鮑羅廷的影響。1927 年 1 月底、2 月初，蔣多次與顧孟餘、戴傳賢（1891-1949）與張人傑（1877-1950）討論驅逐鮑羅廷之事，不過這幾位蔣口中的「書生」對此均感疑慮。「余必欲去鮑爾廷顧問，使政府與黨部能運用自由也，彼等恐牽動大局，不敢決斷。書生辦事，誠非敗壞不可也」。⁸³ 2 月 1 日蔣決定妥協，「八時起床，與張戴顧各同志商議黨務及鮑事，吾不忍為帝國主義者之

⁷⁶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 23 卷第 23 號（1926 年 12 月），頁 143。

⁷⁷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 2 冊，頁 2。

⁷⁸ 根據譚延闓所記，「開會，議黨部政府設南昌事，子文抗事，公博巽語，靜江、孟餘持之甚堅，吾依違而已，餘皆不發言，遂決暫緩遷移」。《譚延闓日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1927 年 1 月 3 日。

⁷⁹ 陳公博著，汪瑞炯、李鐸、趙令揚編註，《苦笑錄》（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79 年），頁 98-106。

⁸⁰ 《蔣介石日記》，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以下省略），1927 年 1 月 4 日。

⁸¹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 203。

⁸²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 2 冊，頁 6。

⁸³ 《蔣介石日記》，1927 年 1 月 27 日。

誹笑，甯屈己卑思，以求革命之發展，故放棄主張，決將政府遷移武昌也。英國派兵恫嚇，日本想來妥協，皆毅然與之決鬥也。生死成敗，置之度外而已，下午回院批閱，寫經緯兩兒各函，不勝感慨與想念而已。舊曆度歲，於此一年中之痛苦艱難，不能與外人道也。」⁸⁴

1月底之時，顧的態度亦有所轉變，李大釗於1月24日寫給他與柏文蔚（1876-1947）、王法勤（1869-1941）、徐謙的信也主張遷往武漢，「夫國民政府定都何所，中外觀瞻所繫，豈能朝令夕更，視若兒戲？以今日論，廣州為革命根據，武漢為全國中心，不留於廣州，必遷於武漢，百思而不可得可以遷移南昌之理由？如為集中起見，如果不為一時軍事上的必需，即介石同志及總司令部亦宜坐鎮武漢，今忽輕易的提起移都南昌，致令外交團對我內部頻生懷疑，以為我之內部中有危機，不然何以遽棄武漢耶？」⁸⁵此信對顧可能有所影響。2月中，漢口的國民黨中央聯席會議發宣傳品，批評蔣的獨裁與張靜江的昏庸。⁸⁶顧並認為蔣對邀汪回國之事並無誠意，⁸⁷因此定下迎汪返國之大計，支持「迎汪復職運動」。⁸⁸蔣感到受顧玩弄，恨之入骨，甚至懷疑他是共產黨間諜，「顧某詆毀中正不遺餘力，以宣傳委員會名義，提倡黨權集中，防制獨裁制，我甚贊成，但CP跨黨，使真正黨員對黨不能信仰，何余欲及時擺脫而又不得苦甚。顧之言行，令人不得不疑其為CP之間諜。彼猶如此，則黨尚能為乎？痛甚」；⁸⁹「杭州佔領，軍事勝利，沉悶憂患中聊作自慰。而政治與黨務之困難，反因軍事勝利而益增。吾黨以孫顧之態度觀之，人心卑污惡劣，一至於此，不敗亦頹，豈其天乎？訓練

⁸⁴ 《蔣介石日記》，1927年2月1日。

⁸⁵ 李大釗，〈李大釗致柏文蔚、王法勤、徐謙、顧孟餘函〉，《李大釗文集》，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958-959。

⁸⁶ 批評蔣的「獨裁」與張靜江的「昏庸」，見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2冊，頁23。

⁸⁷ 蔣中正於1926年10月3日曾電請汪兆銘返國「共荷艱鉅」。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1冊，頁528-529。但顧孟餘一直不相信蔣，他告訴陳公博：「蔣介石天天說要請汪先生回國，都不是誠意的。」陳公博，《苦笑錄》，頁106。

⁸⁸ 此一運動從1926年8月即開始，共產黨結合在廣東及北伐中崛起的反蔣派系，又支持親汪的軍人唐生智，抑制蔣中正的勢力。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70、73。

⁸⁹ 《蔣介石日記》，1927年2月18日。

不到，良心墮落之所致也」。⁹⁰ 2月24日，蔣又派陳公博赴武漢與宋子文、孫科與顧孟餘討論，為促成黨內團結，決議遷都武漢。⁹¹

1927年3月7日蔣接到顧孟餘轉來汪兆銘返國的電文，在時間上已經延遲了1個月，「接顧孟餘轉來精衛電文，掩藏一月之久，至今日政府遷去而始寄來，其播弄挑撥，幸災樂禍，小生之貪諂，不知有羞恥事。亡黨賣國無所不為，可歎。」⁹² 蔣又說：「武漢徐顧搗亂已極，亡國亡黨，在所不恤，而以必倒中正個人以為快，多見其不自量也。」⁹³ 3月10-17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南洋大樓召開，「通過了譴責蔣介石軍事獨裁，統一黨的領導權，統一革命勢力等一系列決議案，決定由汪精衛擔任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主要領導職」。⁹⁴ 此外，於4月2日成立中央土地委員會，委員有鄧演達、徐謙、顧孟餘、譚平山(1886-1956)與毛澤東等5人，來推動農民運動，以解決土地問題。⁹⁵ 4月初汪兆銘返國，抵達上海，4月5日與陳獨秀(1879-1942)發表聯合宣言，號召兩黨同志「事事開誠」。⁹⁶ 10日汪至武漢，受到譚延闓、顧孟餘等人盛大的歡迎。⁹⁷ 蔣認為汪、陳之聯合宣言顯示汪乃袒共，⁹⁸ 4月12日，在上海展開清共，並在南京成立政府。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蔣並發文否認武漢國民黨的決議：「第二屆第三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皆為徐謙、鄧演達、顧孟餘等，受俄顧問鮑羅廷之指揮所顛倒，所有由該會議產生之機關，其所發命令，本會亦認為發生疑問，並請貴委員等應按酌事實，分別接受與否；其准予接受施行者，以備下屆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追認，其有不得不否認者，應暫時擱置。因中間夾雜有

⁹⁰ 《蔣介石日記》，1927年2月19日。

⁹¹ 陳公博，《苦笑錄》，頁105。

⁹² 《蔣介石日記》，1927年3月7日。

⁹³ 《蔣介石日記》，1927年3月17日。

⁹⁴ 吳克輝，〈北伐時期「迎汪」事件探究〉，《理論界》，2011年第6期(2011年7月)，頁113。

⁹⁵ 李戡，《國民黨員毛澤東》，頁309-313。

⁹⁶ 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頁76。該宣言內容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1冊(臺北：國際關係研究所，1969年)，頁231-232。

⁹⁷ 《譚延闓日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1927年4月10日。

⁹⁸ 陳公博，《苦笑錄》，頁111。

便於叛徒之命令，恐適釀大患也。」⁹⁹

5月之後，共黨繼續在各地推行激烈的工農運動，6月6日顧孟餘與汪兆銘、譚延闓、嘉倫（Galen，原名 Vasily Konstantinovich Blyukher, 1889-1938）等人率隨從部隊近400人，乘火車赴河南鄭州，與馮玉祥、張發奎等會議，討論豫陝甘3省事務，並設立開封政治分會。6月11日汪、譚等人先返，顧孟餘與徐謙則在河南處理後續事務，至7月5日方返回武漢。¹⁰⁰ 7月15日，汪知悉蘇聯顧問鮑羅廷欲分化國民政府，以助中國共產黨奪取武漢政府權力之策略，武漢國民政府也決定分共，結束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武漢的和平分共固然有現實的考量，然而顧孟餘與周德偉的想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思想上，顧孟餘不同意武漢政權「極左路線」的土地沒收政策。在分共之前，顧即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表示蘇聯的政治航線與國民黨的政治航線不同，隱含反共之意，為此顧頗受中共之忌恨。¹⁰¹ 在方法上，顧孟餘與周德偉力主和平，認為「分共，送之出境可也，不必效法京滬之殺人，累及無辜。蓋一開殺戒，不能制軍人行動之橫暴，累及無辜，差也。」¹⁰² 後來武漢分共未殺一人，深得輿論及人民之同情。1927年年底，汪前往廣州，想依賴張發奎與南京對抗，發生了廣州事變與武裝暴動等。國民黨內對汪展開攻擊，汪再度流亡法國。1928年1月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決議「汪精衛、陳公博、顧孟餘、甘乃光四人應停止出席，交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處分」。¹⁰³ 2月2日，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三大，組成了以譚延闓為主席的國民政府和以蔣中正為主席的軍事委員會，4日，通過蔣所提「黨務政治之徹底更始案」，「黨內黨外均應徹底更始，重新團結，以謀黨基之安定，而利革命之進行」。7日選出蔣中正、丁惟汾、譚延闓、戴傳賢、于右任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¹⁰⁴ 此次會議之前，中央黨部執監聯席會議曾對粵籍委員參與問題有所討

⁹⁹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1冊（臺北：國史館，2003年），頁232。

¹⁰⁰ 《譚延闓日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1927年6月6日至7月5日；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2冊，頁216。

¹⁰¹ 〈顧孟餘先生事略〉，收入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17輯，頁565-566。

¹⁰²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205。

¹⁰³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25卷第5號（1928年3月），頁130。

¹⁰⁴ 秦孝儀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1卷（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68年），頁199-200。

論，「介石主席，蔡子民提出彈劾案」，後來決定何香凝（1878-1972）、王法勤、陳樹人（1884-1948）等人可以參加，¹⁰⁵汪兆銘、甘乃光、陳公博、顧孟餘等人則被限制出席。¹⁰⁶至 1928 年 8 月 8-15 日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開會前，廣西派委員如李宗仁（1890-1969）、李濟琛（1885-1959），以及監察委員李石曾、張靜江、吳稚暉、蔡元培等，對廣東派委員的出席仍有意見。後來粵方委員出席者 5 人，為何香凝、陳樹人、王法勤、王樂平（1884-1930）、潘超雲，而陳公博與顧孟餘則未出席。¹⁰⁷

二、改組派與擴大會議

汪出走之後，陳公博與顧孟餘為重振革命精神，宣揚改組國民黨之理念，在蔣的同意下，由宋子文出資協助，在上海分別辦了兩份刊物，一為陳公博主持的《革命評論》，一為顧孟餘主持的《前進》。¹⁰⁸陳公博談到：「我辦《革命評論》，所有文章都署名，他們辦《前進》，文章署名與不署名隨各人的自便。這個辦法決定後，我便找宋子文，……他答應每月補助我們三千五百元，二千元是辦《革命評論》，而一千五百元是辦《前進》。」¹⁰⁹兩刊經費上的差異與陳、顧兩人辦刊的方向有關。顧的個性謹慎，他「無意廣收徒眾，藉以避免誤會」，他說：「余辦

¹⁰⁵ 《譚延闓日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1928 年 1 月 31 日。

¹⁰⁶ 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頁 115。

¹⁰⁷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 2 冊，頁 301。王樂平於 1930 年 2 月 18 日在上海被蔣派人所刺殺。汪兆銘、陳公博、顧孟餘等人為此曾發表聲明，抗議「蔣系這次的野蠻卑怯的行為」。查建瑜編，《國民黨改組派資料選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589-592。

¹⁰⁸ 《革命評論》於 1928 年 5 月 7 日出刊，至 1928 年 9 月 11 日發表啟事，宣布停刊。《前進》半月刊於 1928 年 6 月 1 日在上海創刊。查建瑜，〈改組派的主要報刊〉，收入查建瑜編，《國民黨改組派資料選編》，頁 701-702。《前進》至 1929 年初才停刊，目前看到的最後一期是第 1 卷第 11 期。

¹⁰⁹ 陳公博，《苦笑錄》，頁 180。蔣對《革命評論》與《前進》的經費補助在胡漢民返國之後因蔣胡合作，「蔣先生要表示示好於胡」而停止補助。然此二刊物在停止補助之後仍繼續出刊，故蔣自 1928 年 9 月起開始查禁改組派的刊物。在《革命評論》、《前進》被國民黨查禁後，陳公博、顧孟餘、潘雲超、施存統等人，先後發《民意》、《民心》、《民主》、《民眾先鋒》等雜誌，亦被查禁。陳公博，《苦笑錄》，頁 184；張順良，〈國民黨中央如何取締改組派的言論及其報刊（1928-1930）〉，《正修學報》，第 20 期（2007 年 11 月），頁 303-325。

刊物，只宣傳中山之主義及反共之主張，且將精選文章，不涉及人事糾紛問題。只擬出一小型刊物，且恐不能按時出版，無須多錢」、「吾輩所主張者，為反對軍事同志專政，不涉及私人恩怨。……凡國民黨人，不論其現在擁護何人，將來均可化敵為友，為吾人之政治資本」。至於陳公博則採取不同策略，他一方面廣收群眾，因此「施存統、劉侃元等共黨份子加入」。而陳公博的刊物則極力攻擊桂系，顧孟餘對此頗不以為然。¹¹⁰

這兩份刊物風格上的差異主要源於理論取向的不同。陳公博說：「《革命評論》的主張著重於民生革命，而在《前進》的主張則著重於民主政治。」陳公博所謂的「民生革命」，是指中國最終革命之鵠的在民生。¹¹¹ 至於顧的主張則是「在民主勢力一天沒有養成而充實之前，一切裁兵計劃都是空談。民主勢力的養成與充實，在中國今日，祇有依靠本黨，依靠本黨的民眾運動」。¹¹² 這兩者的不同，又牽涉到兩人對於社會階級的看法。陳公博主張「社會有階級的，不過我想以黨的力量調和而至消滅階級的鬥爭」，對他而言，「國民革命應該以農、工、和小資產階級為基礎」；¹¹³ 顧孟餘則為避免階級鬥爭起見，根本否認階級的存在與唯物史觀，他認為國民黨的基礎是農民、工人及一般小市民，但不能說國民黨只代表這些人。他針對先前在武漢政權時，共產黨對農民與土地問題的政策與做法，於雜誌上發表多篇關於「中國農民問題」的文章，從理論與實際，闡明中國社會非階級社會，力闢階級鬥爭之謬。顧也認為馬克斯與恩格斯的唯物辯證法並非基於科學與實證的研究，只能說是一種玄學。¹¹⁴ 後來汪兆銘設法調停雙方，然而改組同志會內部的理論「自始就沒有統一」。¹¹⁵

1928年11月28日，改組同志會正式成立，至1931年方解散，為期約兩年，主要參與者有顧孟餘、陳公博、王法勤、何香凝、王樂平、朱霽青（1899-1955）、陳樹人、甘乃光等人，以顧、陳為領袖。該會以國民黨正統自居，聲稱

¹¹⁰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212-213。

¹¹¹ 陳公博，《苦笑錄》，頁188。

¹¹² 公孫愈之，〈為第五次會議再進一言〉，《前進》，第1卷第5期（1928年8月），頁2。

¹¹³ 陳公博，《苦笑錄》，頁188。

¹¹⁴ 有關陳公博支持馬克斯觀點與顧孟餘反對馬克斯觀點之對照與分析，參見 Wai-chor So, *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1924-1931*, pp. 63-68, 151-153.

¹¹⁵ 陳公博，《苦笑錄》，頁189。

「本會繼承本黨孫總理的革命精神，以至誠接受孫總理的全部遺教，和第一、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綱領，集合革命同志，努力改組運動，務期重新建設能擔負實現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而後已」。¹¹⁶成立之初，蔣對此深表不滿。1929 年 3-9 月，蔣中正在日記中大罵改組派與共產黨，對他來說兩者沆瀣一氣：「近日以來，改組派、共產黨反動傳單約有卅餘種之多，民眾與黨員信仰不堅者，頗為誘惑」、「改組派反動之極，反對收回中東路權。國民多視外交非己事。嗚呼！人心已死，可悲也乎」、「對敵易而對所部實難也。共產黨、改組派之造謠惑眾，無中生有，亦以今日為甚。內憂外患，公義私情，未有如今日之難也」。¹¹⁷1929 年 6 月 28 日，陳果夫（1892-1951）也建議蔣通緝改組派領袖，「弟此次北上，親見北方黨務複雜已極，改組派及各種反動勢力到處活動、破壞中央，或勾結土劣、或誘脅青年，甚至軍閥時代之舊官僚政客，亦操縱搗亂于幕後，謀危本黨、毫無忌憚。弟認為非進一步嚴懲紀綱，不足以戢奸邪而正人心。擬請提出常會，將顧孟餘、陳公博、朱霽青、郭春濤及其他改組派首領，令行通緝，同時並將在粵謀亂之人，一併由國府通緝，庶幾視聽一新，種種妖言鼓動，無所憑以求逞，而後可謀根本上統一黨內之意志，以保黨基於不墜，兄等之意如何，即請商決示復。」¹¹⁸

在具體行動上，1929 年 3 月 15 日，蔣在南京召開國民黨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20 日通過「一警告汪先生，二開除顧孟餘黨籍三年，三永遠開除甘乃光和我〔按：陳公博〕的黨籍」。¹¹⁹此舉造成反蔣勢力之團結。汪兆銘的改組派與西山會議派在樹立民主、反蔣獨裁的目標之下結合在一起。此外，顧孟餘還建議汪做兩件事：第一，聯絡素來反對汪的桂系軍人，爭取其支持；第二，聯絡北方軍人閻

¹¹⁶ 改組派的綱領見陳公博，〈黨的改組原則〉，《革命評論》，第 10 期（1928 年 7 月），頁 1-5；參見張順良，〈析論國民黨改組派的由來、起迄時間與綱領〉，《正修通識教育學報》，第 2 期（2005 年 6 月），頁 337-360。

¹¹⁷ 《蔣介石日記》，1929 年 3 月 14 日、8 月 4 日、8 月 19 日。

¹¹⁸ 吳淑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6 冊（臺北：國史館，2003 年），頁 96。

¹¹⁹ 陳公博，《苦笑錄》，頁 208。亦參見〈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 26 卷第 10 期（1929 年 5 月），頁 162，3 月 20 日條。該會開會前兩天，1929 年 3 月 13 日「汪兆銘、王法勤、陳公博、王樂平、顧孟餘、陳樹人、何香凝、甘乃光、潘雲超等十四人宣言反對南京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 2 冊，頁 438。

錫山與馮玉祥。¹²⁰ 1929年10月11日，國民政府以「勾結軍閥餘孽，破壞國軍編遣之進行」下令追緝改組派人士，「各機關一體按名協緝，務獲歸案嚴辦，以遏亂萌，而肅綱紀」。¹²¹

1930年中，陳公博、汪兆銘、顧孟餘等先後離開香港到北平舉行擴大會議，結合閻錫山(1883-1960)、馮玉祥與南京中央對抗。¹²² 汪兆銘於7月15日離港，7月23日抵達北平，陳璧君(1891-1959)、顧孟餘與曾仲鳴(1896-1939)等同行。¹²³ 8月7日在北平舉行第一次會議，通過「擴大會議處置大綱」、「中央政治會議規則」，並推定顧孟餘、潘雲超、傅汝霖(1895-1985)、薛篤弼(1892-1973)、張知本(1881-1976)等人出任宣傳部委員。¹²⁴ 9月2日顧孟餘等7人出任約法起草委員。¹²⁵ 9月25日擴大會議移至太原開會，至10月27日完成「太原約法」。如陳克文(1898-1986)所述，改組派成為擴大會議之靈魂。擴大會議並沒有得到具體的結果，只能說「它前後兩次宣言所提的有關政治、軍事和黨務的主張不能不說在當時較為開明，較為符合民主原則的」，並對後來「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有所影響。¹²⁶ 沈雲龍(1909-1987)則認為「『太原約法』為擴大會議最具意義之唯一收穫」。¹²⁷ 後因張學良(1901-2001)派兵入關，閻、馮軍事失敗，11月1日汪偕陳、顧、曾等經大同、雁門關，取道內蒙南下，擴大會議垮臺。¹²⁸

¹²⁰ 望塵生，〈顧孟餘之錦囊〉，《社會日報》，上海，1931年5月27日。

¹²¹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26卷第23號(1929年12月)，頁114；〈國民政府令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國民政府公報》，第292號(1929年10月12日)，頁1。

¹²²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45》，頁1356。

¹²³ 〈汪精衛到北平〉，《通問報：耶穌教家庭新聞》，1407回(1930年7月，第29號)，頁12。

¹²⁴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27卷第19期(1930年10月)，頁128；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3冊，頁205。

¹²⁵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27卷第21號(1930年11月)，頁113。

¹²⁶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45》，頁1363、1357。

¹²⁷ 沈雲龍，〈擴大會議之由來與經過〉，《傳記文學》，第33卷第4期(1978年10月)，頁19。

¹²⁸ 有關擴大會議，可參見沈雲龍，〈擴大會議之由來與經過〉，頁11-20；陳進金，〈另一個中央：1930年的擴大會議初探〉，收入國史館編，《國史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五屆討論會》，第2冊(臺北：國史館，1999年)，頁1441-1470。

肆、九一八事變至豔電間顧與汪蔣之合作 (1931-1938)

自 1931 年九一八事變之後至 1938 年 12 月汪兆銘發表豔電，脫離重慶，對日和談為止，在蔣、汪合作的架構下，顧孟餘有更多在政治上表現的機會。九一八事變之後，國民黨內部要求團結的聲浪日增。¹²⁹ 10 月 19 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凡因政治關係，遭開除黨籍者，一律恢復」，其中包括汪兆銘、顧孟餘、陳公博、甘乃光等。¹³⁰ 此後「顧先生力主團結禦侮，促成南京與廣州兩方面的合作，以抵抗日益危急的局勢，可以說奠定八年抗戰的基礎」。¹³¹ 12 月 15 日蔣同意下野。18 日顧孟餘與陳璧君、陳公博代表汪與蔣協商，希望蔣參加政府、主持監察院，蔣應允。在出席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時，蔣中正在日記中對汪派的顧、陳、王等深感痛恨，「上午與顧孟餘、陳公博、王法勤三君談話後，到一中全會，腐惡敗類，凡為余之仇敵，皆被余打倒者，今皆齊集一堂，與之相晤，余對彼等惟有可憐可笑，可歎，而毫無芥蒂之嫌，以若輩敗類，皆不足為我仇也」。¹³² 在四屆一中全會中，顧孟餘出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之委員。12 月底汪指派顧孟餘、陳公博與陳果夫聯絡，商討汪蔣合作。後由孫科短暫出任行政院長（1932 年 1 月 1-29 日）。至 1932 年 1 月中，蔣將一封親筆函交顧孟餘轉汪兆銘，後與汪在杭州會談。蔣、汪雙方達成協議，由蔣主理軍事及剿共，汪出掌行政院。¹³³

一二八淞滬戰役爆發，國府決定遷至洛陽。1932 年 3 月 9 日，國民政府特任顧孟餘為鐵道部長。此後約 3 年間，在蔣、汪合作的格局之下，顧孟餘負責全國鐵路建設，為剿共與抗戰的基礎建設而努力，並與蔣多所互動。3 月 22 日蔣與

¹²⁹ 有關此時國民黨內部派系之爭與最後達成團結之經過，請參考金以林的研究。金以林，〈汪精衛與國民黨的派系糾葛——以寧粵對峙為中心的考察〉，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7 年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頁 450-473。

¹³⁰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 3 冊，頁 534。

¹³¹ 梅恕曾，〈顧孟餘先生的生平與往事〉，《傳記文學》，第 29 卷第 1 期（1976 年 7 月），頁 8。

¹³² 《蔣介石日記》，1931 年 12 月 22 日。

¹³³ 陳公博，《苦笑錄》，頁 273。

顧談話至 11 時。¹³⁴ 是年年底，顧孟餘赴武漢視察路政、參加鐵路材料會議（11 月 28 日-12 月 7 日），並就粵漢鐵路修築¹³⁵、「川戰問題」與「邇來鐵部歸併交部之說……赴漢謁蔣」。¹³⁶ 11 月 29 日，顧與陳布雷（1890-1948）、陳立夫（1900-2001）、胡適等人在蔣中正位於武漢的寓所晚餐，飯後顧又與胡適討論「代表民意機關的選舉原則」，至夜深始散。¹³⁷ 不過如上所述，蔣在考慮身邊人才問題時，從來沒有將顧視為自己的政治人才。¹³⁸

顧任職鐵道部之後一絲不苟、以身作則，「對於路政頗有整頓決心，對於職工教育特別注重」。¹³⁹ 除了決定大的方針之外，也躬親瑣事，顯示他在工程與材料方面的專業，「凡鐵道用的機件，物料，那一種適用，那一種能夠經久，都詳細指示，使得屬下肅然，不敢以事涉專門而有所馬虎。如何造房子，他也懂得，……雖然說鐵道部錢多，也得有辦事認真的人來主持才得有工精料足的結果」。¹⁴⁰ 在重大工作上，首先依賴中英庚款與發行公債等，恢復粵漢路的工程。1932 年 6 月 19 日蔣中正指示：「粵漢路之重要與緊急，實比其他鐵路為甚，近聞只由南段韶關修起，而北段尚未準備同時興修。則此路不知成於何日？焦急之至！務希該部長設法由北段同時並修。如工程費無現款，則可以庚款為基金，分期發行公債。中當盡力促成，並期於民國二十四年底通車，則國防尚有可為。再杭甬路尚有一段未成。此路甚短，且於沿海國防，為東南唯一鐵道。如此路果

¹³⁴ 《蔣介石日記》，1932 年 3 月 22 日。

¹³⁵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 29 卷第 8 號（1932 年 11 月），頁 57。

¹³⁶ 〈鐵路材料會議 昨行閉幕禮 顧孟餘親自出席致訓 希望逐步進行決議案〉，《中央日報》，南京，1932 年 12 月 8 日，版 7；〈顧孟餘赴漢任務〉，《社會日報》，上海，1932 年 12 月 7 日，版 1。

¹³⁷ 胡適著，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集》，第 6 冊，頁 632-633。

¹³⁸ 《蔣介石日記》，1932 年 6 月 22 日。金以林認為 1932 年是蔣從軍事領袖轉為政治領袖的關鍵一年。他努力思考「無幹部」、「無組織」的問題，並多方聯絡知識界。然而作者指出：「在蔣介石反復提到的幹部名單中，主要是原本得到他信任的幹部，和一些黨外的知識分子，幾乎沒有一人是原黨內反蔣的汪精衛、胡漢民等派系成員。」金以林，〈蔣介石的一九三二年〉，收入呂芳上策劃、導讀，《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1 年），頁 234。呂芳上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 3 冊，頁 679。

¹³⁹ 九君，〈顧孟餘新猷——注意職工教育〉，《福爾摩斯》，上海，1932 年 7 月 11 日，版 1。

¹⁴⁰ 查子仁，〈談顧孟餘〉，《好文章》，1948 年第 2 期（1948 年 2 月），頁 55。

成，則寧波、上海可省數倍兵力，如能於庚款中提出修築，則輕而易舉也。」¹⁴¹ 顧也了解到「日本對我國多方壓迫，華北情形日形緊張，而共匪又在贛南活動，粵漢鐵路的地位太關重要」。¹⁴² 1932 年 8 月他找了當時隴海鐵路工程局長兼總工程師的凌鴻勛負責株韶段 450 餘公里、工程款高達 4、500 萬英鎊的鐵路工程。¹⁴³ 根據凌鴻勛的回憶：「在我和孟餘先生第一次而且時間較長的談話中，發現他態度非常誠懇，而且的確有學者的風度」；「我和他無一面之交。他把株韶段的事情交給我之後，的確給我全權，一點干預都沒有，幾年功夫，從來沒有薦過一個人給我，連整個鐵道部也沒有薦一個人給我。而且我有公事向他請示，他的回電總是自稱弟孟餘，這一點我覺得很不容易。我們兩人既然建立了彼此的互信，我就專心做我的事。顧先生這個人別的我不知道，但在謙虛這點上看來，真是一個書生本色，沒有官僚的氣味。」¹⁴⁴

後來粵漢路的株韶段因為顧在工程款上的大力支持，進行順利，提早完成。1935 年顧孟餘又想派凌鴻勛兼任京湘鐵路贛湘段工程局長兼總工程師，負責由南京經南昌到萍鄉的京湘鐵路，以此連接粵漢鐵路。後因顧孟餘去職，凌鴻勛也隨之辭職。凌對顧的印象是：「彼此信賴，內外呼應」，因而能成就事業。¹⁴⁵

顧任鐵道部長時似乎與汪較為疏遠。1932 年 8 月，汪與張學良因日軍進攻熱河之後在和戰問題上發生衝突，10 月辭職赴歐，至次年 3 月才回來。這時報紙上屢屢傳出顧、汪不合的消息。「顧孟餘自長鐵道部之後，固以發財為第一目的，但欲發財，自非有清一色之人物不可，於是顧孟餘造系之念日切，一方面並將汪之親信，如曾仲鳴等之實權取銷，其用心可謂惡毒，是無怪汪之氣憤填〔膺〕而亟求出國也」。¹⁴⁶ 另一報紙則報導顧孟餘任鐵道部長任內不為改組派同志安插位置，因而受辱，又被曾仲鳴（1896-1939）所排擠，故拉攏王世杰等人自組

¹⁴¹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 3 冊，頁 679。

¹⁴² 凌鴻勛，〈悼念顧孟餘先生——並述粵漢鐵論之一段故事〉，《傳記文學》，第 21 卷第 2 期（1972 年 8 月），頁 27。

¹⁴³ 沈雲龍訪問，林能士、藍旭男記錄，《凌鴻勛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年），頁 94-95。

¹⁴⁴ 凌鴻勛，〈悼念顧孟餘先生——並述粵漢鐵論之一段故事〉，頁 26-28。

¹⁴⁵ 凌鴻勛，〈悼念顧孟餘先生——並述粵漢鐵論之一段故事〉，頁 28。

¹⁴⁶ 〈短小精悍 顧孟餘組系心切〉，《社會日報》，上海，1932 年 11 月 2 日，版 1。

「教育系」。¹⁴⁷ 這些消息雖真偽難判，然此時汪、顧的關係可能已經有所變化。

相對而言，此時顧與蔣之間互動較多。1933年6月8日，為清剿共軍，蔣一方面在南昌召開五省剿共軍事會議，同時致電財政部次長鄒琳、鐵道部長顧孟餘、軍政部次長陳儀（1883-1950）、交通部長朱家驊，商築萍玉鐵路：「查萍玉路由贛省萍鄉至玉山，西接株萍、粵漢，東通杭江，轉達杭甬，倘速築鐵道，則湘、黔、粵、桂，皆可不經長江而有陸路交通，與京滬聯為一氣。憶前年援滬抗日之棘手，即知此路在國防上位置極為重要，計全長僅六百公里，而能貫通西南、東南諸省，首尾相應，效用綦宏。其在贛省，則可穿越東西兩匪區，尤盼修築，以利清剿，並藉工事，足以收容難民，一舉數善，亟應促其成功。日前在牯嶺，曾商由汪院長返京提出院議，頃悉交由財、鐵、軍、交四部審查，特電陳概要，請熟察，此路關係非同尋常，迅籌切實辦法，趕緊進行，是所切禱。」¹⁴⁸ 12月8日，蔣再次為萍玉鐵路事通電顧孟餘，希望由江西省與鐵道部合作修築此一鐵路。¹⁴⁹

上述兩個直接由蔣指示興辦的鐵路建設工程都具有軍事上的重要性，是為了剿共之布局。除此之外，顧孟餘還從事多項借款修築鐵路，計有：平漢路、滄石路、平綏、隴海路、大潼路等對外借款。¹⁵⁰ 在這些借款中，顧被人指控「收取回扣」，除中飽私囊外，據說還要與汪兆銘分成，並為改組派籌措「公積金」，用來在香港開辦四海銀行。¹⁵¹ 此時報紙上有不少關於顧孟餘貪贓枉法的報導：

鐵道部長顧孟餘，固亦改組派中之幸運兒，聞在正太鐵路借款項下，不費吹灰之力，由其部屬，報酬其大洋四千萬，更不暇詳計，但祇就此一筆而論，則顧所發之財，決不在二陳之下，可憐黨紀先生，為他們升官，為他們發財，其本人則眾叛親離，焦頭爛額而去國，其痛心可

¹⁴⁷ 左君，〈顧孟餘創立新教育系之動機〉，《福爾摩斯》，上海，1933年6月16日。

¹⁴⁸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0冊（臺北：國史館，2005年），頁400。

¹⁴⁹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4冊，頁245-246。

¹⁵⁰ 先導出版社編，《監察院彈劾顧孟餘案始末記》（出版地不詳：先導出版社，出版時間不詳），頁4，本書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

¹⁵¹ 先導出版社編，《監察院彈劾顧孟餘案始末記》，頁8。

知也。¹⁵²

顧孟餘自易鐵道部以來，毀譽參半，顧至今日，罪惡彰著，乃有黨員陳柏英、杜明笙等五十八人，臚舉顧孟餘之十大罪狀，上呈各機關各法團以及各報館，所謂十大罪狀者，一為盜黨為奸、見利忘本，二為妄耗國庫、以供私人揮霍，三為舞弊分肥、有損官常，四為利慾熏心、網羅宵小，五為濫支路帑、藉遂私圖，六為私用同學、貪潤私囊，七為破壞路政、干犯路章，八為仰承軍人鼻息、損失國權，九為私用女婿、損失對外威信，十為包庇親戚、弁髦國法，此皆孽孽大者也。¹⁵³

1934 年 6 月 28 日，監察委員劉侯武（1894-1975）為顧孟餘「對大潼路購料訂約，有違法舞弊情事」、¹⁵⁴「喪權違法，害國營私」，向監察院長于右任提出彈劾案。劉本為安南華僑，也是改組派的一員，「劉在華僑頗有聲望，改組派之經濟活動，得劉之力頗不少」。彈劾案提出後，顧謂：「劉失節叛變也」。¹⁵⁵ 7 月 1 日，顧發表書面談話，對彈劾案提出 4 項申辯。¹⁵⁶ 對於此案，汪極力予以營救，他反駁報紙言論，甚至提議修改「彈劾法」，提高中央政治會議對此類案件之裁決、覆核權。對此，蔣也相信顧並無貪污。1934 年 5 月 11 日，蔣電于右任：「聞監委劉侯武近以修築大潼關鐵路購買材料一事，提案彈劾孟餘，已指定楊天驥、劉莪青、李正樂三委員審查。按孟餘在部長任內清廉穩健，迄未改學者態度，實可信其無他，年來整理鐵路，頗有頭緒，對外信用亦日漸提高，於路改建設，實心努力，實可稱佩，想兄亦所素稔，其經辦事件，但求大體無差，實非中飽，則縱或有手續末節不合，亦宜諒其勇事急功之誠，加以原恕，尚希兄婉為解釋，務予設法打銷此案，以免其正在進行之各種路政建設計畫，遭受影響。轉致因小誤大，區區此意，當荷洞諒。如何仍盼電復。」他又電汪兆銘曰：「孟餘同志，

¹⁵² 〈短小精悍 顧孟餘發了大財〉，《社會日報》，上海，1932 年 11 月 28 日。「黨紀先生」指汪兆銘。

¹⁵³ 〈顧孟餘之十罪狀〉，《社會日報》，上海，1933 年 2 月 17 日。

¹⁵⁴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 31 卷第 15 號（1934 年 8 月），頁 73。

¹⁵⁵ 道盜，〈劉侯武與顧孟餘〉，《社會日報》，上海，1936 年 2 月 8 日。

¹⁵⁶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 31 卷第 15 號（1934 年 8 月），頁 74。當時擔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王子壯（1901-1948）曾記述此事，他說：「自星期日監察院將彈劾顧孟餘案之原文發表，顧立有萬言答辯之談話，反唇相譏，詞近謾罵。」王子壯，《王子壯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年），1934 年 7 月 3 日，頁 94。

清廉穩健，弟所深佩，已另電右任懇切言之，毋令借故糾紛，京中迭生麻煩，實可痛心，一切請兄忍耐，並盼勿以瑣事而秘不告，蓋積瑣成鉅，吾人不能不同心協力、刻刻警戒也。」¹⁵⁷ 9月22日，「購料合同案全部既經審查明確，決定不予懲戒」。¹⁵⁸ 從政治局勢與權力鬥爭的角度來看，顧案是孫科、于右任等聯合反汪的一次嘗試，「以劉為工具耳」。¹⁵⁹ 蔣處於蔣、汪合作之格局，1934年2月11日汪、蔣通電全國「救亡圖存之方案，以治標莫急於剿除赤匪，治本莫急於生產建設」，希望順利展開剿匪、建設以抗日，彈劾顧會影響蔣、汪合作，故採取「袒汪抑于」的政策，使顧案最後以「不予懲戒」收場。¹⁶⁰

此後顧孟餘繼續從事多項鐵路建設，至1935年12月調任交通部長（1935年12月12日-1937年3月4日），由張公權（1889-1979）接任鐵道部長遺缺。12月12日蔣「通電顧孟餘曰：今已發表兄為交通部長，部務不可一日無人，請兄即日蒞京面商一切」。¹⁶¹ 然而顧到南京之後，蔣卻因為事情太忙無法接見。此舉令顧大為惱火。蔣在日記中提到：「孟餘以昨未晤，今晨即回滬，心甚不快，世人不知余之忙迫與苦痛。昨日自朝至晚幾乎無片刻暇咎而猶以為不見客，發怒招怨非孟餘一人而已也。」¹⁶² 這一件事情之後，顧、蔣關係不甚和睦，蔣希望顧出任中政會祕書長，他卻屢屢稱病請辭。甚至蔣多次請汪出馬協助，顧亦不改初衷：「電復上海汪兆銘，元辰電敬悉，中政會祕書長非孟餘先生擔任不可，駱先本擬今

¹⁵⁷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6冊（臺北：國史館，2006年），1934年5月11日，頁66-67。

¹⁵⁸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8冊（臺北：國史館，2007年），1934年9月22日，頁68。

¹⁵⁹ 有關彈劾案與國民黨內派系鬥爭，以及彈劾案背後之政治目的，劉維開根據1943年7月3日《王子壯日記》指出，「劉侯武原為改組派人士，以要求不遂，改投孫科，孫欲取鐵道部長一職與馬超俊，現于右任與孫科合作以反汪故以劉為監委而打擊顧。『此于孫之共同政策以劉為工具耳』」。劉維開，〈訓政前期的黨政關係（1928-1937）：以中央政治會議為中心的探討〉，《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4期（2005年11月），頁107。

¹⁶⁰ 硯農，〈三週間國內外大事紀要：自二十八年二月一日起至二十八年三月一日止〉，《國聞週報》，第11卷第9期（1934年8月），頁1；段智峰，〈蔣汪合作格局下的另一種局面——以1934年顧案為中心〉，《民國檔案》，2011年第1期（2011年4月），頁103-110。

¹⁶¹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4冊（臺北：國史館，2009年），頁634。

¹⁶² 《蔣介石日記》，1935年12月15日。

日北上就醫，彼實有病，茲特強留半月，暫代孟餘職務，切盼其速來京」、「孟餘先生何時來京？務請再為催促，以交部事非其到京，不能進行也，如何？盼復。」¹⁶³一直到西安事變之前，蔣仍繼續努力延請顧到南京來協助，然顧均未應允：「電上海顧孟餘，告以先生休養已久，尊體諒已復元，騶先兄將赴浙江就任，務望先生即日命駕入京，主持委會為盼。」¹⁶⁴

有關顧在 1935 年底被任命為交通部長後至七七事變之間的情況，多不為人所知。顧其實並未就任該部長職，交通部的主要工作均由蔣的同鄉與親信、常務次長俞飛鵬（1884-1966）代理。主要因為 1935 年 11 月汪兆銘在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上遇刺，被軍人、鐵血鋤奸團團員孫鳳鳴（1905-1935）擊中 3 槍，造成重傷。12 月外交部次長唐有壬（1893-1935）亦遇刺身亡。次年 2 月，汪兆銘前往歐洲療養，至 1937 年 1 月方回國。汪被刺之後，汪派的勢力大受打擊，然而在汪派人物之中，唯一未隨汪出國而去職的政治人物就只有顧，這引起許多揣測。1937 年的一篇報導可見其端倪，「前歲汪精衛在五全會前被狙擊，身負三創而去國，掀動政治微波，其左右如陳公博曾仲鳴谷正綱等，亦隨汪而受黜。獨顧孟餘既辭鐵長矣，復遷交通，時人以為異數，而不知此迺一種政治手法，所謂『欲取故予』者也。詎顧燭其謀，固辭弗就，年來蟄居滬寓，杜門謝客。」¹⁶⁵

如上所述，顧在鐵道部長任內即有報紙報導他與汪的關係較為疏遠，這可能也涉及兩人對和戰問題的不同看法。1933 年「塘沽協定」簽訂前，5 月 21 日顧孟餘與王世杰商訂對日政策，曾致書汪兆銘「力主維持政府歷來外交政策，必于國聯監視或列強居間調停之下，方與日本交涉」，「廿三日晚，復與孟餘聯名以一函致汪，力主避免文字的協定，并主張召回黃郛；對西南政府則主極端隱忍」。¹⁶⁶這時顧孟餘仍對和談抱著謹慎而樂觀的態度，只希望不因協定而影響國府對東三省與熱河問題之作法。至 1935 年汪主持行政院與外交部，推行對日妥協外交。

¹⁶³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26 冊，1936 年 1 月 15 日、1936 年 2 月 8 日，頁 112、554。

¹⁶⁴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39 冊（臺北：國史館，2009 年），1936 年 12 月 1 日，頁 351-352。

¹⁶⁵ 汲冢，〈顧孟餘悄然去國〉，《天文臺半週評論》，香港，1937 年 3 月 17 日，頁 4。

¹⁶⁶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年），1933 年 5 月 25 日，頁 1-2。

7月時中日有「何梅協定」，國軍退出河北，取消國民黨在河北的活動，並禁止該省一切反日活動。汪所主導中日之間的和平談判受到國內主戰派的反對。顧孟餘曾為此勸汪急流勇退，他與王世杰、彭學沛（1896-1949，汪派成員）、石瑛（1879-1943，時任考試院銓敘部長）等人一起署名致函汪，請其改變對日妥協方針，並辭去外交部長：

今後對日外交似可立以下方針：甲、對日不為激怒之舉動或言論。乙、對於無關重要之事項，雖不妨為權宜之措置，但對於一切含有直接或間接承認滿洲國之危險以及他種關係主權之事項，決不讓步。丙、對乙項方針宜常有堅決表示，以杜日方僥倖覬覦之心。丁、必須假想敵方於最近期內對於華北或華中，將為再度之武力壓迫，因此，汪先生應與蔣宋諸公切實會商，迅速對於政府安全，軍事佈置，以及財政外交等事，極力準備，以免臨事陷於屈服或崩潰之窮境。戊、凡任敷衍日本工作之人，不宜在國防或外交機關居負責地位，以防因敷衍而輕為許諾，鑄成大錯；或因不能滿足對方要求而失其機能；并防引起國民或國際之猜疑，減損政府之權威。……日本對於中國之壓迫，必將繼續不斷；此種壓迫，無論出以何種方式，均將使吾國外交當局感受重大困難。倘政府領袖直當其衝，尤易陷於窮境。故汪先生絕不宜繼續兼署外長，而須速覓外交部長之繼任人選。外部宜交與無親日色彩亦不受日本嫉視之人如顏惠慶等維持，根本方針自仍須秉命於政府領袖。¹⁶⁷

然而汪不肯接受他們的建議，後來情況越演越烈，才出現刺汪之事。報刊上曾有文章對此有所評論，「廿四年秋，日寇華北急，舉國目汪為親日魁首，顧嘗以急流勇退勸汪退讓賢路，毋為世人罵也，汪弗聽，顧迺患而稱病，走北平，久久不歸，汪莫奈何，即以曾仲鳴權代鐵道部務，其後果有十一月十二〔日〕之變，喋血都門，負傷幾死」。¹⁶⁸汪被刺殺之後，顧心灰意冷而退隱北京，1936年7月，報紙報導顧在北京遁入佛門：「顧行蹤不明，經多方刺探，始知顧在北京逃禪，一說僅歸依佛法，一說已正式披剃為僧。」¹⁶⁹「前任鐵道部長中委顧孟餘，不就

¹⁶⁷ 「王世杰、彭學沛、石瑛、顧孟餘函汪兆銘」（1935年），〈汪兆銘投敵前與政府首要函電（一）〉，《汪兆銘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48-005。

¹⁶⁸ 汲冢，〈顧孟餘悄然去國〉，《天文臺半週評論》，香港，1937年3月17日，頁4。

¹⁶⁹ 〈顧孟餘出世〉，《晶報》，上海，1936年7月20日。

交通部長後，即行隱居他鄉，友朋間亦絕無音信往還，……良以顧氏鑑于汪氏熱心衛國，遭此不幸暗算，因感政治與社會，不適于學者性之接近，故具此消極之決心，隱姓埋名以去耳。又有人云，顧已出家為僧，此說尚待互證，總之在現時各方尚未知顧氏所在地，則為事實云。」¹⁷⁰

1937 年 1 月西安事變之後，汪兆銘回國。在此之前，他曾表示希望顧孟餘、陳公博與陳璧君到新加坡去接他。¹⁷¹ 後來陳璧君去新加坡迎接，陳公博留在香港與國民黨中央所派的邵力子（1882-1967）、周佛海（1897-1948）、周啟剛（1896-?）等人在港候駕，並於 1 月 14 日同船返抵上海。¹⁷² 但顧一直沒有出現，「連歡迎電報也不發一個」，直到汪回國之後，他方至上海拜謁。¹⁷³

汪回國之後，顧似乎仍有意與汪疏遠。1937 年 3 月 9 日，他與蔣中正在上海見面，「上午在滬寓會客，顧孟餘來談，謂對現局應急其要者、大者，不應放鬆之事，決不可放鬆，公謂其言頗中肯也」。¹⁷⁴ 隔了幾天，3 月 12 日他就帶著夫人去了歐洲，「顧氏十二日自滬乘意船干德華地號放洋，十四日過港，原輪赴歐，夫人韋增英〔瑛〕女士同行」，「一來一去，背道而馳」。¹⁷⁵ 當顧在英國時，汪兆銘曾託駐英大使郭泰祺（1888-1952）轉交一封電報，表示目前要持久抗戰，希望他能利用機會「在歐洲策動輿論」，並允諾給予經費支持，顧似乎並未依照指示辦

¹⁷⁰ 露軒，〈顧孟餘中委何往〉，《晶報》，上海，1936 年 7 月 21 日。

¹⁷¹ 〈汪精衛電陳璧君〉（1936 年 12 月 14 日），蔡德金輯，〈西安事變前後汪精衛與陳璧君等來往電函〉，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近代史資料》，第 60 號（1986 年），頁 133。

¹⁷² 李珂，〈陳公博〉（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287。

¹⁷³ 報紙上有人猜測「上年因汪氏慘遭狙擊，扶病出國，他的部下，也大半離開南京。這次汪氏又扶病回國，將到香港了，……在汪氏左右地位最崇高的，要算是陳公博和顧孟餘了。陳公博如今早已到香港迎汪，顧孟餘卻聲息全無，還在北平養病。正在這迎汪聲中，忽然消息傳來，說顧氏已經看破紅塵，在西山碧雲寺出家，……厭棄政治生涯，不願再列身仕途了。」秀水，〈汪精衛返國聲中的顧孟餘——北平西山禮佛參禪？〉，《福爾摩斯》，上海，1937 年 1 月 11 日。

¹⁷⁴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0 冊（臺北：國史館，2010 年），1937 年 3 月 9 日，頁 254。

¹⁷⁵ 汲黯，〈顧孟餘悄然去國〉，《天文臺半週評論》，香港，1937 年 3 月 17 日，頁 4；〈顧孟餘赴歐〉，《申報》，上海，1937 年 3 月 16 日，版 14。

理。¹⁷⁶ 同年 10 月，顧氏夫婦自英國返回上海。¹⁷⁷

這時汪兆銘正積極朝著和平之路前進。陳公博說：「自西安事變發生後，汪先生更是傾向和平，以為中國對日應該尋出一條和平之路。」¹⁷⁸ 汪也表示：在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我對中日戰爭，固然無法阻止，然而沒有一刻不想著轉圜」，「對於日本，本著冤仇宜解不宜結的根本意義，努力於轉敵為友」。¹⁷⁹ 周佛海說在廬山談話會之後，即以汪為中心策劃了一系列與日本交涉的計畫。在淞滬會戰失利、南京陷落、政府機關遷至武漢後，求和的氣氛更是濃厚。¹⁸⁰

1938 年 4 月初，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選蔣、汪為正、副總裁，汪、蔣再次合作。¹⁸¹ 4 月 8 日國民黨中央「互選常務委員並通過各部部長及任命秘書長」，蔣屬意由顧孟餘出任宣傳部長，並請汪兆銘說服顧接受。汪乃去函顧：「轉孟餘先生鑒：蔣先生在全會提請兄任宣傳部長，周佛海、董顯光為副部長，弟曾再三說明兄未必就，蔣先生堅持並囑弟力勸。弟意國難如此。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況宣傳部在抗戰期間，舍軍事外實為最要，以兄主持黨內外，皆慶得人，盼兄勉為提任，剋日前來，至懇至懇。銘。」¹⁸² 不過顧仍然沒有改變心意，「孰料消息傳來，顧氏留港，毫無所動」，宣傳部長由周佛海代理，周佛海得知之後「不勝焦灼，以致全夜未能安睡。」¹⁸³

此時顧雖退居幕後，然其對時局與汪之動向仍頗為留心。武漢失守之後，

¹⁷⁶ 「汪兆銘函顧孟餘」（1937 年 9 月 4 日），〈國際各方有關方面致汪兆銘函電〉，《汪兆銘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56-032。

¹⁷⁷ 〈顧孟餘抵漢談歐由觀感〉，《申報》，上海，1937 年 11 月 28 日，版 2。

¹⁷⁸ 陳公博，《苦笑錄》，頁 409。

¹⁷⁹ 汪兆銘，〈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三民週刊》，上海，第 1 卷第 1 期（1939 年 8 月），頁 19-22，這是 1939 年時汪回憶自己在 1937 年時的想法。

¹⁸⁰ 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頁 169-173。

¹⁸¹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45》，上冊，1938 年 4 月 2 日，頁 209。陳克文對此頗感振奮，認為此舉可以終止國民黨內鬥。

¹⁸² 「汪兆銘函顧孟餘」（1938 年 4 月 8 日），〈汪兆銘與汪政府各省市長函電（一）〉，《汪兆銘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19-065。

¹⁸³ 信陵，〈政海秘聞：顧孟餘有官不做〉，《晶報》，上海，1938 年 5 月 13 日。當晚陳布雷將此事電告周佛海，見周佛海著，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全編》，上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 年），1938 年 4 月 8 日，頁 110。

1938 年 11 月 22 日顧孟餘從香港發了一封電報給汪：「重慶汪主席都密，弟觀最近內外形勢，言和已不可能。餘。」¹⁸⁴ 汪顯然不接受他的建議，12 月底發表豔電。汪交待陳公博將豔電帶至香港，交《南華日報》林柏生（1902-1946）發表，顧得知之後先與陳公博、林柏生發生激烈辯論，堅持汪之宣言不宜發表。¹⁸⁵ 陳公博與林柏生也將顧孟餘的看法告訴剛從河內飛抵香港的周佛海，周佛海「深不以為然，主立即發出，多數人數日商量之結果，決不能以一人之意見而改變」。¹⁸⁶ 根據陳春圃（1900-1966，陳璧君之姪）的回憶，1938 年 12 月 27 日下午 4 時，他去陳公博的九龍塘私宅訪問，陳告訴他當時的情況如下：

汪精衛即托陳〔按：指陳公博〕帶了親筆函連同自擬的響應近衛第三次對華聲明的〈豔電〉電稿交顧孟餘，以為顧會同意；不料顧孟餘看畢之後大吃一驚，表示反對說：「萬萬不能發表，這是既害國家又毀滅自己的蠢事。我馬上去電力爭，未得他〔按：指汪〕復電之前千萬不要發表，如怕遲誤一切由我負責」。陳唯唯而退，即歸告周佛海於九龍塘約道 5 號。不料周聽了大怒，竟暴跳如雷地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因為顧孟餘一人的反對就不依期發表，那就散伙好了。我沒有什麼關係，馬上可以回重慶見『蔣先生』認錯請罪，料想不會有什麼問題。打開天窗說亮話，事已至此還有什麼商量的，幹就幹，不幹就拉倒。顧孟餘不過是個部長，我難道就沒有當過部長嗎？怎麼可以因他一人反對就推翻一切，連電報也壓住不發呢？」¹⁸⁷

顧對此感到無奈，直接發電報給汪兆銘，試圖阻止，「鄙意響應近衛聲明有百害而無一利，惟此層非一二言所能詳，但就先生對中央建議之此係內部商討大

¹⁸⁴ 「顧孟餘電汪兆銘」（1938 年 11 月 22 日），〈抗戰前汪兆銘與各方首要函電〉，《汪兆銘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55-023。

¹⁸⁵ 林柏生的部分，參見陳克文的日記：「據香港方面的傳說，汪先生的豔電是林柏生和梅思平等發表的，顧孟餘極不以為然，曾因此掌林之咀。汪先生被開除黨籍的消息到港後，柏生知己闖禍，通電話至口顫手震云。」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45》，上冊，頁 380。

¹⁸⁶ 周佛海著，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全編》，上編，1938 年 12 月 29 日，頁 217。

¹⁸⁷ 陳春圃，〈汪精衛集團投敵內幕〉，收入黃美真編，《偽廷幽影錄——對汪政權的回憶》（上海：東方初版社，2010 年），頁 74-75。陳春圃又說陳璧君得知之後僅淡淡地說「學者膽小，不足以謀大事」。

計，今既提出應俟中央決定，不宜再在報章發表，以免公開決裂。如〔公〕開決裂，則對內、對外其影響之惡必至不可收拾，其結果與先生所期望者，或正相反。頃與公博先生談亦完全贊同此意。特電奉商，如承允諾，祈即電示柏生先生照辦，餘尚有進言。孟餘豔」。¹⁸⁸此電發出之後並未能改變汪的決定，此後顧與汪、陳等人分道揚鑣，顧投向了蔣的陣營。陳公博在 1939 年時曾告訴陶希聖：「我〔公博自稱〕與孟餘一同跟隨汪先生多年，二人不同之處，是孟餘冷得下來，我冷不下來，……所以這次孟餘脫離了汪先生，我仍然跟著他走。」¹⁸⁹

伍、豔電之後顧蔣的合與分（1939-1949）

顧在反對汪兆銘的豔電以及汪與中央決裂之後，一直蟄居香港。重慶方面，蔣得知汪出走之後，1938 年 12 月 24 日，曾由朱家驊致陳公博一電報，希望轉給汪副總裁，「萬懇晤見副總裁時委婉陳詞，切請千萬珍重，仍本年來為黨、為國領導諸同志之苦心。偕兄返渝，黨國幸甚」。¹⁹⁰等到確定汪的去向後，國民黨在 1939 年 1 月 2 日先開除汪兆銘的黨籍，再選孫科接任副總裁。中共方面則由周恩來（1898-1976）發表談話，首先他對汪的反叛並不驚訝，並說此舉對時局並無影響。接著又說：陳公博與顧孟餘是否會參加汪的行動「刻尚未定」。¹⁹¹此時顧孟餘、陳公博與梅思平（1896-1946）等人在香港仍有聚會，商討因應之方。¹⁹²1939 年 6 月 28 日，汪派在上海籌組各委員會之工作時仍表示「軍事由葉蓬主持，政治由周佛海主持，文化由林柏生主持（林未到滬前，由殷汝為暫代），經

¹⁸⁸ 「顧孟餘電汪兆銘」（1938 年 12 月 29 日），〈汪兆銘投日前與政府首要函電（二）〉，《汪兆銘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49-056。

¹⁸⁹ 《陶希聖年譜初稿》（未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民國 28 年〉。

¹⁹⁰ 「朱家驊電陳公博」（1938 年 12 月 24 日），〈汪兆銘與中國國民黨有關之各項函電（一）〉，《汪兆銘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05-065。

¹⁹¹ 〈周恩來談話：對汪反叛並不驚異 謂與時局毫無影響〉，《申報》，上海，1939 年 1 月 3 日，版 8。

¹⁹² 〈汪精衛任意造謠 陳公博顧孟餘等在港有集議〉，《申報》，上海，1939 年 1 月 10 日，版 3。

濟內定由顧孟餘負責。另組國民黨代表大會籌備處及特務部由褚民誼主持」¹⁹³，可見此時顧仍被視為汪派的核心成員。

至 1939 年中期，蔣開始主動爭取顧的支持。1939 年 7 月 1 日，在蔣的授意下王世杰飛抵香港。3 日，王世杰記載：「昨晚晤顧孟餘，據云汪先生此次行動，陳璧君負大部分責任。」8 日汪返回重慶後，向蔣報告了在香港的工作狀況。幾個月之後，蔣又親自寫了一封信給顧，「今日午後蔣先生作一函致顧孟餘，促其來渝，似欲孟餘加入行政院」（1939 年 11 月 22 日）。顧對此有所動心，11 月 27 日去電王世杰，表示願意前往重慶。12 月 8 日，王世杰在日記中記載：「顧孟餘自港來渝。蔣先生告我欲其留渝，藉以影響外間對汪之觀感。據孟餘言，陳璧君對偽組織事已趨消極。」¹⁹⁴

顧到重慶之後十分低調，然不久此一消息即為新聞界所得知。最早是由美國媒體美聯社發出報導。12 月 16 日陳璧君在香港的報紙看到顧去重慶的消息，她立刻拍了電報給汪兆銘。電文中表示幾天前她曾派人往訪顧孟餘，顧之家人告知他去了上海，不知是否屬實，陳要汪立刻派人去上海找顧：

密前三日烈往訪顧孟餘，其家人云顧已赴滬，今日各報載美聯社〔消息〕顧已抵重慶。此事我不問其是非如何，但我不相信。其原因兄亦可想而知。……始有顧上海住址，始到後請囑其按址往訪，如確可見顧，則彼餘情尚在，請出力勸回，如不見顧，則恐真赴重慶矣。¹⁹⁵

顧赴重慶一事逐漸被媒體證實。1939 年 12 月 17 日《紐約時報》刊出顧抵重慶的消息，標題為“MAY JOIN CHIANG REGIME: Ex-Wang Aide, Now in Chungking, Slated for New Ministry”（可能加入蔣陣營：前汪派人物，現居重慶，可能為新的部會首長）。¹⁹⁶至 1940 年 1 月，中外文報紙也刊出了顧孟餘赴渝的消息。1 月

¹⁹³ 「汪系最近在滬活動情形」（1940 年 6 月 28 日），〈汪兆銘叛國（一）〉，《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652-0008。

¹⁹⁴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頁 208-209、237、238、240。

¹⁹⁵ 「陳璧君電汪兆銘」（1939 年 12 月 16 日），〈汪兆銘組偽政府時各方函電〉，《汪兆銘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52-089。

¹⁹⁶ “May Join Chiang Regime: Ex-Wang Aide, Now in Chungking, Slated for New Ministr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7, 1939.

12日《申報》報導，「顧氏係於上月由港飛抵重慶，聞曾切實聲明反對和平運動。顧氏與政府各領袖，晤談後甚洽，旋於12月14日飛返香港」。¹⁹⁷消息刊出之後，汪派立即「否認顧孟餘曾至重慶」，不過重慶方面則立刻予以反駁。¹⁹⁸1940年1月17日《北華捷報》也確認顧抵達重慶。¹⁹⁹此後幾個月，顧似乎往返於香港、重慶之間，可能在8月舉家遷至重慶。根據《事略稿本》，蔣於1月14日「電香港顧孟餘請即駕面敘」；5月3日「電香港顧孟餘，請早日飛渝相助」；8月7日「上午批閱文件，正午宴顧孟餘夫婦。」²⁰⁰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病逝香港，顧孟餘深感哀痛，他參加了3月7日在香港摩理臣山道福祿壽殯儀館的葬禮，²⁰¹又在《東方雜誌》上寫了〈憶蔡子民先生〉一文。他認為蔡元培開啟了近代追求思想自由、研究自由之風，並開闢以科學方法整理國學之途徑。²⁰²隨著蔡元培的過世，出現了中央研究院院長繼任人選的問題。王世杰認為顧孟餘最適合，3月7日他說：「關於中央研究院院長之繼任人選，余與段書詒及張岳軍言，認顧孟餘為適當，並擬向各方推薦」。又在3月14日展開推薦活動，「今晨傅孟真、汪敬齋〔緝齋〕來談，謂翁詠霓極思繼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職。余告以余不欲當選為候補人，並謂院長席以專任為宜，顧孟餘可供考慮」。²⁰³蔣接受了王世杰提名顧孟餘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建議，並請陳布雷向翁文灝（1889-1971）接洽，希望評議會能選出顧孟餘。²⁰⁴翁於是將此一消息散布出去，沒想到傅斯年（1896-1950）聽到之後，勃然大怒，認為這是蔣「下條子」。²⁰⁵3月21日陳布雷也聯繫了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1890-

¹⁹⁷ 〈外交部發言人 鄭重闢謠〉，《申報》，上海，1940年1月12日，版3。

¹⁹⁸ 〈顧孟餘留渝時 訪各要人〉，《申報》，上海，1940年1月14日，版3。

¹⁹⁹ "Dr. Ku Meng-yu Did Visit Chungking," *North China Herald*, January 14, 1940.

²⁰⁰ 蕭李居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3冊（臺北：國史館，2010年），頁44、499；薛月順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4冊（臺北：國史館，2010年），頁146。

²⁰¹ 運公，〈舉國悼念蔡元培〉，《東方雜誌》，第37卷第8號（1940年4月），頁55。

²⁰² 顧孟餘，〈憶蔡子民先生〉，《東方雜誌》，第37卷第8號（1940年4月），頁63。

²⁰³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1940年3月14日，頁257。

²⁰⁴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1940年3月20日，頁258。

²⁰⁵ 〈傅斯年致胡適〉，收入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2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頁1098。

1974)，傳達蔣的意旨，竺認為「恐評議會中通不過」。²⁰⁶ 其他的評議員對此案均有所保留，如汪敬熙（1893-1968）認為顧「只是個 politician」；陳寅恪（1890-1969）強調學術自由，又說院長必須在國外學界有聲望，「我們不能單舉幾個蔣先生的秘書」。²⁰⁷ 3 月 23 日評議會選舉，投票結果翁文灝 24 票、朱家驊 24 票、胡適 20 票，而顧孟餘只得到 1 票。²⁰⁸ 蔣所屬意的顧孟餘沒有當選，顧本身似淡然處之，不以為意。²⁰⁹ 蔣表面上不露聲色，「笑了一下」，內心可能對翁與朱的「忤旨」有所不滿。²¹⁰ 當時最高票的翁、朱均負擔重要職務（分別擔任經濟部長與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長），蔣擬調胡適返國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4 月 30 日，「電王寵惠請與孔祥熙切商駐美大使胡適之繼任人選」。²¹¹ 不久胡適來信表示「不就中央研究院院長職」。²¹² 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至 9 月 18 日蔣指定朱家驊為「代理院長」，至 1957 年 10 月辭職，總計代理了 18 年。

中央研究院院長一事不成之後，蔣又想請顧出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祕書長，11 月 6 日曾親自召見，「正午，約顧孟餘來談，勸其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祕書長」。²¹³ 1940 年 11 月 8 日王世杰記載，「今午晤顧孟餘。蔣先生欲其任國防最高委員會

²⁰⁶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第 7 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 年），1940 年 3 月 21 日，頁 321。

²⁰⁷ 傅斯年，〈傅斯年致胡適〉，頁 1098。

²⁰⁸ 樊洪業，〈中央研究院院長的任命與選舉〉，《中國科技史料》，第 11 卷第 4 期（1990 年 12 月），頁 52，根據《竺可楨全集》，第 7 卷，1940 年 3 月 23 日所記之票數，頁 322。

²⁰⁹ 陶英惠，《典型在夙昔：追懷中央研究院六位已故院長（上）》（臺北：秀威資訊，2007 年），頁 211。

²¹⁰ 傅斯年，〈傅斯年致胡適〉，頁 1100。

²¹¹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 6 冊，頁 299。此一決定可能受孔祥熙的影響，1940 年 4 月 7 日；《王世杰日記》記載：「杭立武為余言，孔庸之欲調胡適之返國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並擬以宋子文使美，宋表示不願往。」見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頁 262。

²¹²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1940 年 8 月 5 日，頁 287。胡適在 1940 年 7 月 22 日記中說明不就任的原因，「今天發憤寫航空信給王雪艇，說我若不做大使，決不就中央研究院院長。因①我捨不得北大，要回去教書。②詠霓或朱驕先都比我更適宜。③我要保存（或恢復）我自由獨立說話之權，故不願做大官。④大使是『戰時徵調，我不敢辭避。』中研院長一類的官不是『戰時徵調』可比」。胡適著，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集》，第 8 冊，頁 58。

²¹³ 薛月順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4 冊，頁 583。

秘書長（張岳軍現任此職，但蔣先生以擬令其赴成都主持行轅或省政）。彼不願就。據彼語予，彼之來渝，係對汪表示反對，但其精力實不能任繁劇」。在顧懇辭之下，1941年4月2日蔣任命王寵惠為國防最高委員會祕書長。²¹⁴

蔣為顧找到的第三個職位是中央大學校長。1941年7月羅家倫（1897-1969）因學校經費支絀、人事紛爭、師生綱紀紊亂，辭去中央大學校長一職。²¹⁵ 蔣希望由顧來接任。事先教育部長陳立夫曾代表蔣與顧相商，顧「謙遜不就」。²¹⁶ 王世杰也與顧討論此事，7月16日，「午後晤孟餘。彼被任為中央大學校長，有畏難之意。予勸其決定仍從事教育工作」。中央大學為國民黨培養幹部的學校，王世杰很清楚地瞭解中大的重要性，「中大之重要，尚不在目前，而在將來遷回首都以後，誠能決心準備以十年、二十年之力，為首都學府，樹良好基礎，其影響所及，將不限于教育本身」。王世杰還說服周炳琳（1892-1963）赴中大協助顧孟餘。周說：「當然，這是我義不容辭的事。」²¹⁷ 1941年8月7日，蔣又親自「約顧孟餘談話，顧氏允就中央大學校長職」。²¹⁸ 8月22日，顧由王德芳（1905-1985，王世杰的姪兒）、范予遂（1893-1983，改組派成員，未隨汪出走）陪同上任，當天中央大學遭日機轟炸，中彈數十枚，受損甚鉅。²¹⁹

顧孟餘上任之後，任命羅家倫時期的重要幹部童冠賢（1894-1981）繼任教務長、谷正鼎出任總務長。²²⁰ 首先，他積極改善中大財政拮据的狀況，向財政部

²¹⁴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4冊，頁163。

²¹⁵ 許小青，《誠樸雄偉——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2年），頁271-288。

²¹⁶ 蔣寶麟，〈抗戰時期的國家與大學政治文化：中央大學「易長」研究〉，《史林》，2009年第3期（2009年6月），頁89-100。

²¹⁷ 張友仁，〈雜憶北大經濟系顧孟餘主任〉，收入《張友仁回憶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83。

²¹⁸ 葉惠芬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6冊（臺北：國史館，2010年），頁590。

²¹⁹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1941年8月22日，頁370；〈顧孟餘接收中大〉，《教育通訊》，第4卷第32、33期合刊（1941年8月），頁7。有關范予遂參與改組派之經過及其與顧孟餘之關係，可參考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組派〉，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 第16卷 總第45-47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頁144-157。

²²⁰ 〈顧孟餘昨接掌中大〉，《中央日報》，重慶，1941年8月23日，版3。

與教育部爭取經費，結果不但補足了原有之虧空，也開始大禮堂與宿舍的建設工程。在治校理念上，顧孟餘採取無為而治、作風明快，並力主學術自由，不受黨派干預。當時在中大任教的郭廷以（1904-1975）說顧校長「風度之佳不可及。他不多管事，不多講話，講起來幾句話簡單明了」。²²¹可見顧孟餘待人處事之風度雍容得體，深得師生之敬愛。

1943 年 1 月，報上傳出顧孟餘辭中大校長，「於月前提出辭呈，周餘未到校辦公」。²²²蔣接到辭呈之後，曾「往訪孟餘談中大校長事」。²²³2 月 15 日「決定親自擔任中央大學校長，以各大學學風之壞已極，非此不足以挽救民族之生命，然可憐亦極矣」。²²⁴2 月 19 日，國民政府正式發布指令，准顧孟餘辭去中央大學校長，由蔣中正兼任中大校長。²²⁵兩天之後，蔣親赴中大，「正午召見中央大學校各院院長，與各主委職員聚餐，訓誡之」；²²⁶並於 3 月 1 日正式上任。

顧辭職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身體因素，無力負擔繁重的校務工作。據說他在擔任中大校長時「兼著譯書籍，因用腦過度成高度神經衰弱症，心理上又侵成恐悸病態，據云顧聽到響聲即驚惶萬狀」。²²⁷另一方面，應該涉及國民黨內陳立夫的 CC 系與朱家驊對於教育系統之掌控而產生的衝突。如上所述，顧在北大即認識同赴德國留學的朱家驊，並共同組織群眾運動；在鐵道部長任內亦曾以經費資助教育部（朱為部長）擬開辦之國立編譯館，每月 5,000 元。²²⁸在 1941 年 10 月，朱家驊（時任組織部長）曾介紹國立編譯館館長辛樹幟（1894-1977）至中大

²²¹ 張朋園等訪問，陳三井、陳存恭記錄，《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年），頁 208-209。

²²² 蔣寶麟，〈抗戰時期的國家與大學政治文化：中央大學「易長」研究〉，頁 95。

²²³ 《蔣介石日記》，1943 年 2 月 11 日。

²²⁴ 《蔣介石日記》，1943 年 2 月 15 日。

²²⁵ 〈國民政府令〉，《教育部公報》，第 15 卷第 3 期（1943 年 3 月），頁 7。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 4 冊，頁 229。

²²⁶ 《蔣介石日記》，1943 年 2 月 21 日。

²²⁷ 望平宣，〈改組派健將：顧孟餘苦諫汪精衛〉，《快活林》，第 14 期（1946 年 5 月），頁 6。

²²⁸ 「民國 21 年〔朱家驊為教育部長〕朱在行政院會議再提〔國立編譯館〕設立，但經費只有 1,500 元經費，經鐵道部長顧孟餘同意每月補助 5,000 元，獲准成立，以辛樹幟為館長，除審查教科書外，主要工作——翻譯外國重要劃時代名著，使國人真正了解西洋文化編譯〔科學名詞〕」。見胡頌平編，《朱家驊年譜》，頁 26。

任教，顧允其擔任「師範學院博物系主任」。²²⁹總之，在國民黨內顧無疑地與朱家驊較接近，而成為陳立夫等人想要打擊之對象。陳立夫所採取的手法，一是指控朱家驊系統的人鼓動中大學生風潮，另一方面則在學校經費上加以封鎖，使顧面臨與羅家倫當校長時類似的財政困境。當時顧頤剛（1893-1980）一方面在中大任教，另一方面也在國民黨組織部工作，他在日記中對此有詳細記載：「陳立夫蓄意統制教育界，非其私人必加以困厄，逼其脫離，屬其私人，則無論如何辦得壞，亦與維持。五年以來，一個個大學收為己有，助紂為虐者張北海、吳俊升也。所未人侵者，中央大學、西南聯大、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四校而已。中大有四千學生、四百教員、七院六十二系，而孟餘先生不肯投降，彼遂以經濟封鎖政策相脅迫，以至一年半來虧空至五百萬元（等於戰前五萬），聞孟餘先生辦不下去，已提出辭職。」²³⁰顧頤剛又補充說明中大在財政上的窘境，「學校過年開銷，教部仍未發下，仍出借貸。此之謂經濟封鎖」。總之，他的日記明白地透露顧辭職的原因，「孟餘先生被陳部長所迫而辭職」。²³¹

顧孟餘遞出辭呈之後，顧頤剛亦跟進，「予對中大學生情感甚好，期望亦殷，而不得不去者，一來事務太忙，休息無時，二則亦不願在 CC 統制下過生活也」。²³²2月17日顧頤剛到國民黨組織部，朱家驊亦表示要顧頤剛處理中大事務時要謹慎，「朱先生囑予勿顧問中大事，因他現在如此避嫌疑，陳立夫猶以鼓動中大風潮中傷之，若我一入漩渦，更將使彼撇不清也」。²³³這些訊息都顯示陳立夫的 CC 系與朱家驊的人馬在中大的角力。

²²⁹ 〈顧孟餘函〉（1941年10月20日），〈人才人事〉，《朱家驊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301-01-23-224。

²³⁰ 參見顧頤剛，《顧頤剛日記》，第5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1943年1月5日，頁7。1943年3月30日顧到編譯館見到張北海，頗感痛恨，「今日得見張北海，一識此『桀犬』、『閹黨』面目」，《顧頤剛日記》，第5卷，頁49。張北海當時任職於國立編譯館，參見沈雲龍、張朋園訪問，林能士記錄，《關德懋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頁28。吳俊升（1901-2000）為江蘇如皋人，東南大學畢業，法國巴黎大學博士。1935年任北大教育系主任。後出任江蘇省教育廳主任秘書。1938-1945年間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長。

²³¹ 雷天模，〈大足小志〉，《國民公報》，重慶，1945年4月9日，見《顧頤剛日記》，第5卷，頁454。

²³² 顧頤剛，《顧頤剛日記》，第5卷，1943年2月2日，頁21；1943年2月9日，頁24。

²³³ 顧頤剛，《顧頤剛日記》，第5卷，1943年2月17日，頁28。

顧孟餘卸任之後，中大人事進行了很大的調整，顧孟餘所任命的親朱家驊系統之人被換下來，CC 系的人則掌握了實權。1943 年 3 月 12 日顧頡剛記載：「中大教務長已發表為胡煥庸，總務長為江良規，皆 CC 系也，誣謂童冠賢、馬洗繁、伍叔儻、沈剛伯及我皆為鼓動學生鬧風潮者。」²³⁴

從中央大學退下來以後，顧孟餘的政治生涯幾乎已告結束。1943 年，蔣中正曾有兩次與他見面，第一次是 8 月 16 日「往訪林故主席靈堂省視後，與顧孟餘談話」。第二次是 11 月 8 日「正午約顧孟餘夫婦聚餐」。²³⁵ 1945 年 5 月 17 日，在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他擔任中央執行委員。²³⁶ 抗戰勝利之後，顧不曾擔任過政府正式的職務。1946 年顧赴美訪問，朱家驊曾經託顧維鈞轉一封信給顧孟餘，請他再度出任中央大學校長，顧孟餘並未應允。²³⁷ 1948 年 2 月 8 日，「聘顧孟餘為國民政府顧問」。²³⁸ 同年 5 月翁文灝出任行憲後首任的行政院長，經過蔣的同意，提名他為行政院副院長，並於 6 月 1 日公布，希望藉助他的長才改善財政經濟。《大公報》及不少民眾認為此一內閣名單因有顧孟餘在內，而有「新意」。²³⁹ 無奈顧孟餘堅拒，蔣又擬提名他為考試院長。6 月 13 日蔣致電顧：「兄對行政院副院長堅辭不受，中甚諒解。但必須兄另受他職，方准辭去。前已推

²³⁴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 5 卷，1943 年 3 月 12 日，頁 41。胡煥庸（1901-1998）為地理學者，畢業於南京高師地學系，為竺可楨的學生，曾任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江良規（1914-1967）為中央大學體育系畢業，獲德國萊比錫大學博士學位，1943 年擔任中央大學體育系主任。兩人均屬於「南高」系統。

²³⁵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54 冊（臺北：國史館，2011 年），頁 308、338。案林森於 1943 年 8 月 1 日因車禍過世。

²³⁶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 年），頁 180。

²³⁷ 電文如下：「中大有自經兄一任校長以後，繼任人選遂一一不滿人意，至今未上軌道。此無異兄負間接之責任。今適兄長北大，鯁兄長武大，情勢不同。公公益盼兄再勉為其難。事關東南文教，請賜惠允。」見「電顧維鈞轉顧孟餘」（1946 年），〈人才人事〉，《朱家驊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301-01-23-724。案胡適於 1946 年 7 月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學校長；周鯁生於 1945 年 7 月任武漢大學校長。1946 年時中央大學校長為吳有訓（1945-1947 任校長），他對國民黨鎮壓學生運動做法感到憤慨，曾多次提出辭職，朱家驊可能因此想請顧孟餘接任。

²³⁸ 程玉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72 冊（臺北：國史館，2013 年），頁 516。

²³⁹ 馮靜甫，〈讀者投書：顧孟餘〉，《觀察》，第 4 卷第 16 期（1948 年 9 月），頁 1。

兄為考試院長，此職重要，但較簡易，務望兄俯就，並提先發表，希勿再辭為盼。」6月14日顧孟餘再度懇辭，「承命擔任考試院院長職務，餘以庸拙，累辱誣諉，聞命之餘，實深慚悚，此次我公行憲伊始，總持國政，凡在舊交，原應竭盡知能，共效壤流之助，惟餘自問違雜實際行政工作，瞬逾十載，平居不揣譎陋，輒以誦習研究為業，疏慵日久，實已無復從改之興趣，復思國家大業，萬緒千端，餘原已早承寵命，備位顧問，竊願勉竭所知，上備諮詢，苟能所貢獻替，其所裨助，或反較多，為此瀝陳衷曲，敬辭新命，務乞恕其愚固，曲賜諒宥，不勝感幸。」²⁴⁰6月21日蔣任命張厲生（1900-1971）為行政院副院長、²⁴¹張伯苓（1876-1951）為考試院長。

1949年初李宗仁出任代總統，為籌組新政府，曾請他出山，協助「謀取和平革新政治」。3月7日孫科請辭行政院長後，繼任者應為何人，各方有不同的看法，坊間雜誌透露李宗仁表示「新閣人選有六人，何應欽、張治中、邵力子、顧孟餘、黃紹紘、閻錫山」；²⁴²不過根據桂系的黃旭初（1892-1975）回憶：「李代總統屬意居正，白崇禧屢薦何應欽，而立法院方面卻推顧孟餘，經考慮後，終以顧為第一人選。」3月9日立法委員范予遂赴上海訪問顧孟餘，表達李代總統邀約之意，但顧以為「當前局勢太難，和戰都無辦法，不願負此重任」，而加以婉拒。²⁴³該年4月共軍渡江，此後顧孟餘往返於廣州、香港之間，最後定居於香港。

²⁴⁰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75冊（臺北：國史館，2013年），頁136-137。

²⁴¹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44卷第7號（1948年7月），頁64。

²⁴² 本刊記者，〈新閣人選有六人：何應欽、顧孟餘、張治中、董紹紘、邵力子、閻錫山〉，《新聞雜誌》，新第2卷第11期（1949年3月），頁2。

²⁴³ 「李宗仁電請梁漱溟顧孟餘來京」（1949年1月24日），見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4冊，頁829；克明，〈顧孟餘有官不做〉，《時局觀察》，第2期（1939年3月），頁16；黃旭初，《黃旭初回憶錄：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的離合》（臺北：獨立作家，2015年），頁327-328。

陸、顧孟餘的晚年：從領導第三勢力到鬱鬱以終 (1949-1972)

面對 1949 年國共內戰中國民黨的挫敗，顧在香港開展一場介於國共兩種勢力之間的新政治運動，此一運動受到李宗仁與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支持。大約從 1949 年 6 月中旬，國民黨高層政治人物即在廣州開始討論組織政團及未來政治上之作法。根據陳克文的記載，6 月 11 日立法院長童冠賢等人「推顧孟餘先生做領導，已經得他的同意」。7 月 24 日陳克文赴香港，處理新政團之經費與房屋租賃問題，「並且和顧先生對於目前的幾個問題交換意見」，決定了未來組織與宣傳之方針」。²⁴⁴ 1948 年擔任廣西省立法委員、李宗仁祕書的程思遠（1908-2005）在回憶錄中說：「（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了《中美關係白皮書》，對國民黨政府採取袖手靜觀政策。一時組織『第三勢力』的呼聲，甚囂塵上。頗負時望的顧孟餘忽於八月十五日應李宗仁之邀，從香港來到廣州，住沙面陳伯莊家，就組織第三勢力問題，與美使館顧問何義均、立法院長童冠賢、總統府祕書長邱昌渭等反覆交換意見，並將可能採取的方案提供李宗仁考慮，結果李宗仁主張：由顧孟餘出面領導，而由他從旁予以支持，並指定我負責居中連繫。這樣，我就往返於港澳、廣州之間，為這個所謂『第三勢力』組織籌措經費佈置人事。」²⁴⁵ 顧孟餘在廣州與李宗仁長談 3 日後，答允出面領導「自由民主大同盟」，張發奎也願意支持。1949 年 9 月初，大同盟於廣州祕密舉行第一次會議，選出顧孟餘為主席，童冠賢、程思遠、邱昌渭（1898-1956）、黃宇人、甘家馨（1904-1977）、李永懋（1903-1977）、尹述賢（1897-1980）等為幹事。並推童冠賢為書記、程思遠為副書記、陳克文為財務組長等。李宗仁捐了 20 萬港幣，另補助顧孟餘 3 萬港幣，1 年後又給顧 6 千美元，大同盟中的幹事、組長每人港幣 5 千元。這些錢都是在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芸（1900-1973）離職時撥給李宗仁的一筆專款項內開支的。²⁴⁶

²⁴⁴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45》，下冊，頁 1234-1243。

²⁴⁵ 程思遠，《政壇秘辛》，頁 222。

²⁴⁶ 程思遠，《政壇秘辛》，頁 234。

1949年10月，該同盟由廣州移到香港。後來顧孟餘、張發奎所領導的第三勢力又聯合了張君勱、張國燾（1897-1979）、李微塵等人，以《中國之聲》雜誌為陣地。此一刊物創刊於1951年10月11日，由張國燾主編，宗旨為反共、反獨裁，每期印數約2,000-3,000本，主要經費由美國人支持，每月約1萬美元。²⁴⁷在1950年代的冷戰氛圍之下，此一政治主張頗難生存，張發奎認為顧孟餘、張君勱等名人與常人無異，張「性格不夠強，說得到做不到」，顧的個性過於謹慎小心、膽小怕事，都不適合擔任政黨領袖，而張國燾「手腳不乾淨」。此外，臺灣以各種方式收買、滲透同盟成員；顧、張又受到來自香港政府的壓力，不久第三勢力土崩瓦解，顧也不得不離港。²⁴⁸

在顧離開港前，蔣中正曾請鄭彥棻（1902-1990）赴港約其來臺「共同努力」。顧表示：「目前的政府已經是絕望的了，掙扎亦屬徒然！」因而無意赴臺。²⁴⁹蔣中正對於顧孟餘等人在1949年之後的所作所為十分不滿，1951年5月3日，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開會，他力主開除顧孟餘、張發奎的黨籍，「到中央黨部會議商討中央委員到期未登記者開除黨籍問題，有人以張發奎、顧孟餘二人暫不開除，免其加入第三勢力。余力持反對，以若輩叛黨不只二次、三次也」。²⁵⁰其後蔣一直密切注意香港第三勢力之發展，1951年6月29日，蔣在日記中表示：「召集情報會談，可知香港所謂第三勢力政客與軍閥欺詐美國，與破

²⁴⁷ 張發奎口述，鄭義譯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頁489。

²⁴⁸ 張發奎口述，鄭義譯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507；鄭義，〈張發奎指揮兩次從蒲臺島反攻大陸夭折〉，收入鄭義編著，《國共香江諜戰》（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年），頁349；程思遠，《政壇秘辛》，頁239-240。林博文說：「香港政府政治部突請顧孟餘去談話，問他是否在香港搞政治活動？是否常去張發奎住宅開會？顧皆否認。政治部的英國官員警告他說：『倘若你再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我們將把你驅逐出境。』從此，顧就與張發奎等人疏遠。」林博文，〈一九四九年後的香港第三勢力〉，《亞洲週刊》，第24卷第2期（2010年1月），頁32-35；劉小清、陳悅，〈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民國春秋》，1997年第6期（1997年11月），頁43-47。

²⁴⁹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45》，下冊，1949年11月23日，頁1282；陳克文，〈國民黨左派三傑：甘乃光與顧孟餘〉，收入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45》，下冊，頁1338。

²⁵⁰ 《蔣介石日記》，1951年5月3日。1950年在臺灣的國民黨曾通知張發奎要重新辦理黨員登記，張接受孫科的建議，「把這一紙『指令』扔進了字紙簍」。張發奎口述，鄭義譯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479。

壞中央之如何卑劣可笑矣。」²⁵¹對他來說，顧孟餘即屬於此類「卑劣可笑」之人。

1952 年 5 月顧孟餘自香港赴日本，住了幾個月，9 月 17 日曾寫信給王世杰，報告他在日本的見聞；王世杰回了一封很客氣的信，然在呈報之時表示他與顧「數年未通訊，此信之來甚為突然」。²⁵²顧在日本擬「創立一所學校訓練第三勢力的青年與幹部」，也努力爭取資助中國學生到日本讀書，不過這些計畫都沒有太多成效。²⁵³後來他從日本去了美國。晚年的顧孟餘，寓居於美國加州柏克萊，從事學術和政策研究，生活並不富裕。胡適、錢穆（1895-1990）與郭廷以等人赴美訪問時，皆曾前往探望。²⁵⁴顧在美生活拮据一事為友人所得知。為資助顧氏，周德偉、李壽雍、許孝炎（1900-1980）、吳鑄人（1902-1984）等聯名寫了一封信給蔣夢麟（1886-1964）、胡適、梅貽琦（1889-1962）、錢思亮（1908-1983）等，表示顧孟餘「近年僑居美國研究學問，無意返國，惟生活困頓」，希望能由中華文化基金會或清華基金「酌撥專款資助」。²⁵⁵此事可能未成。1956 年 8 月 24 日，顧因經濟問題拜託芝加哥總領事余星燦帶信向朱家驊求助，表示「窘困情形，望能臂助」。朱則請總統府祕書長張群（1889-1990）協助，張在報告蔣之後決定依照朱家驊之建議，將 1949 年之後歷年積欠「資政義津公費及隨從祕書薪水」共 3,000 美元一次匯給顧氏夫婦，並允諾此後每月再匯 60-70 美元之津貼。朱並

²⁵¹ 有關蔣中正對於顧孟餘、張發奎等醞釀第三勢力之態度，可參考陳三井，〈蔣介石眼中的香港自由民主運動〉，收入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型塑——領袖的淬鍊》，第 1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年），頁 575-582。

²⁵² 「顧孟餘致王世杰函」（1952 年 9 月 17 日），〈往來函電〉，《王世杰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302-01-03-11-655。

²⁵³ 張發奎口述，鄭義譯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 503。

²⁵⁴ 1956 年 1 月 4 日，「顧孟餘先生來談……今天我們暢談甚快」，見胡適著，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集》，第 9 冊，頁 165。錢穆記載：1960 年曾赴耶魯大學講學，回程在舊金山住了兩星期，「顧孟餘夫婦在加州，美琦留學時，亦曾數赴其家。於與孟餘初不相識，至是始獲見面。孟餘夫婦親駕車來三藩市旅社接余夫婦作郊遊，並至其家餐敘，招待殷勤。然絕不與余談及國內政事一語，與前儼似兩人矣」。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 年），頁 302。胡美琦的回憶，參見胡美琦，〈紀念顧孟餘夫人〉，《傳記文學》，第 29 卷第 1 期（1976 年 7 月），頁 26；郭廷以，《郭量宇日記殘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年），1958 年 3 月 24 日、4 月 4 日、4 月 8 日、4 月 10 日；1960 年 8 月 24 日；1963 年 3 月 9 日、7 月 8 日、7 月 10 日。

²⁵⁵ 「周德偉等致胡適等函」，〈南港檔〉，《胡適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藏，館藏號：HS-NK05-043-022。

勸顧氏「羈棲海外自非久長之計，仍祈設法回臺」。顧孟餘在 10 月 19 日回信致謝，表示收到張群來信，又說：「連年飄泊，精力頹敝，固因年事漸長，而故鄉之思亦最是催人衰老」，但並未提及返臺之事。²⁵⁶ 1958 年錢穆曾去函顧孟餘，邀約他至香港新亞書院任教；顧在回信時「只謝賓四對他的關切，並未具體提到東歸意想，事情就此告一段落」。²⁵⁷ 1959 年 12 月 15 日，王世杰赴美訪問時又勸顧孟餘返臺定居，「下午往 Berkeley 訪顧孟餘君及其夫人，談約二小時。余告以彼儘可回臺北閒住，可說話則說話。既不做官，自無重大煩惱之可慮」。²⁵⁸ 顧氏返臺之行因各種因素，拖了 10 多年。1969 年 8 月，他因身體欠佳、不良於行，終於決定返回臺灣，表示要堅決為反共而奮鬥。8 月 12 日抵達臺北，張群、黃少谷、谷正綱與袁守謙（1903-1992）等人至機場接機。²⁵⁹ 顧氏返臺一事得到蔣中正的同意，作為「總統的客人，……是總統請他回來的」，而且「他回國不久，總統和夫人就去探望他，……使他感到很安慰，也很高興」。²⁶⁰ 1972 年 6 月顧病逝於臺北榮民總醫院。他過世之後，王世杰記載：「顧孟餘先生來臺一年有餘，常在病中（足不能行），屢次入榮民醫院治療，未能有何效果，月前在該院逝世。孟餘為一沉默寡言而意志堅強之人，近年對於政治未嘗有何評論。」²⁶¹ 1975 年 12 月顧孟餘夫人韋增瑛女士亦過世，享年 91 歲。²⁶²

柒、結論

本文以顧孟餘的政治生涯為中心，探討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 20 世紀之曲折命運。顧的一生屬於書生從政的類型；此一情況與單純的學者或遊走於政治與學

²⁵⁶ 「朱家驊致顧孟餘函」（1956 年 9 月 26 日）、「顧孟餘致朱家驊函」（1956 年 10 月 19 日），〈人才人事〉，《朱家驊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301-01-23-744。

²⁵⁷ 胡美琦，〈紀念顧孟餘夫人〉，《傳記文學》，第 29 卷第 1 期（1976 年 7 月），頁 26。

²⁵⁸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下冊，頁 925。

²⁵⁹ 〈總統府資政顧孟餘返國〉，《中央日報》，臺北，1969 年 8 月 13 日，版 1。

²⁶⁰ 張研田，〈迎接顧先生回國定居的經過〉，《傳記文學》，第 29 卷第 1 期（1976 年 7 月），頁 24；顧孟餘返臺之事，陳世驤曾參與勸說，後來陳世驤將此事之前因後果寫信告訴張河田，參見張河田，《追憶集》（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79 年），頁 79-88。

²⁶¹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下冊，頁 1443-1444。

²⁶²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下冊，頁 1676。

術之間的知識分子有所不同。顧的從政生涯涉及近代中國兩件重要之史事：一、國民黨內的汪、蔣之爭與對日和戰問題；二、國共之爭。顧的一生命運與他對這兩大問題的抉擇密切相關。

首先，就汪、蔣與和戰問題來說，顧經歷了挺汪到擁蔣、主和到主戰的轉變。1924 年顧加入國民黨之後，成為汪兆銘之首席智囊。此後汪派的重要決策，如武漢分共、改組派、擴大會議等多由他與陳公博兩人來議定、領導。在這一段期間，顧高舉反蔣大旗，痛批其軍事獨裁。其後，他藉著汪蔣合作之契機，於 1932 年出任國府鐵道部長，支持蔣之剿共與抗日，對抗戰時期鐵路建設貢獻良多。在汪派之中，他是屬於與陶希聖、樊仲雲（1901-1989）等類似，主張「不反抗中央，而以在野之身，協助政府謀取和平」的一派。²⁶³ 在 1938 年底武漢失守後，顧了解到和談已不可能，曾力勸汪放棄和平運動之路，卻不為汪接受。豔電之後，他公開反對汪兆銘，轉而投入蔣的陣營。蔣則任命他為中央大學校長，又提名他擔任行政院副院長、考試院長（均未上任）。就汪蔣與和戰之爭來說，他和胡適、陶希聖等人類似，都是先支持汪，再擁護蔣；就時間點而言，胡適最早轉向，在 1935 年 7 月胡適已認識到「和平終不可得」，1937 年八一三淞滬戰役後確認「和比戰難」。²⁶⁴ 顧孟餘是在 1938 年底豔電之後，反對和談，至 1939 年底赴重慶抗日。陶希聖則要到 1940 年 1 月高陶事件，在香港《大公報》揭露汪日密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及其附件，才心生悔悟，瞭解汪所謂和平運動就是徹底的投降與賣國。²⁶⁵ 顧在關鍵時刻轉向，能堅持民族大義，和而不同，使他免於像汪兆銘、陳公博、林柏生、周佛海等被認定為漢奸之命運，因而能夠「在國土之上壽終正寢」，可謂大節無虧。²⁶⁶ 不過就他與蔣的關係來說，雙方始終不甚親近，由於他深沉多慮之性格，多次以健康欠佳為由，婉拒蔣之邀約。顧的下場與陶希聖的情況截然不同，陶在揭露日汪密約後，向蔣輸誠，因而獲得重用，成為蔣的核心幕僚。

²⁶³ 「汪系內部互相猜疑派別紛爭」（1939 年 4 月 24 日），〈汪兆銘叛國（一）〉，《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6052-0008。

²⁶⁴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 年），頁 57-58。

²⁶⁵ 高宗武著，陶恒生譯，《高宗武回憶錄》（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 年）。

²⁶⁶ 陳克文，〈國民黨左派三傑：甘乃光與顧孟餘〉，頁 1335。

其次，就國共之爭來說，顧經歷了從聯俄容共，到分共、反共的歷程。1924年之後，他接受孫中山聯俄容共之想法，努力促成國共合作，在國民黨內他與李大釗私交甚篤，又與陳公博、甘乃光等齊名，號稱「左派三傑」。1927年武漢分共之後，轉而反對共產黨激烈的主張，亦在理論方面反對共產黨的階級分析與唯物史觀。他認為中國並無階級存在，應使各種背景之人共同參與國民革命，而革命之目標在實行民主。此後他一直堅決反共，1949年之後，他對蔣與國民黨喪失信心，因而與張發奎、張君勱等人投入國共之外第三勢力之政治運動。此一運動失敗之後，他遠走美國，至晚年返回臺灣定居之時仍表示「堅決反共」，不過他也認識到這需要長期的努力，說不定彷彿明末清初時反清復明之志士，「要經過一兩百年後，才能顯出效果來。」²⁶⁷

顧的一生反映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無奈。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威之結合在理想的情況之下是「以義相交」，為共同的理想而努力。汪與顧早期之交往，在某種程度上屬於此類，汪對他幾乎是言聽計從，兩人「是志同道合的夥伴」、「如魚之得水」。²⁶⁸然而在關鍵時刻，汪卻不能接受顧之建議。至於顧與蔣，雙方從一開始就是「道不同而不相為謀」，顧並不認同蔣的人格與專政、獨裁的作風。然而1938年底汪出走之後，他喪失了長期投資的政治資本，體認到在外敵侵略、國家面臨生死存亡之際，不能不與蔣合作。蔣對顧一意籠絡，不過他顯然也深知此人曾多次「叛黨」，不可盡信。顧、蔣兩人最後分道揚鑣，實事出有因。不過兩人之間雖有不愉快，然在私交上能全始全終，也很不容易。蔣一直稱顧為「孟餘同志」而多次提拔。1950年代中期第三勢力運動失敗，他赴美定居，1956年之後蔣不但長期資助其在美之生活費，又協助其返臺定居，顯示蔣亦有豁然大度的一面。顧孟餘曾說：「如果是道義的結合與思想的相同，出自自然，才有力量」²⁶⁹，這應是他發自內心的深刻感觸。顧的一生見證了知識分子與政治領袖合作的困難，「得君行道」是20世紀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努力追求而難以實現的一個夢想。

²⁶⁷ 陳克文，〈國民黨左派三傑：甘乃光與顧孟餘〉，頁1338。

²⁶⁸ 胡耐安，〈皓首榮歸顧孟餘〉，《傳記文學》，第22卷第3期（1973年3月），頁32。

²⁶⁹ 白瑜，〈出身世家而愛惜羽毛的顧先生〉，《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1976年1月），頁17。

附錄：顧孟餘著作目錄

一、期刊雜誌、報紙

- 顧孟餘，〈馬克思學說〉，《新青年》，第 6 卷第 5 號（1919 年 5 月），頁 1-15。
- 顧孟餘，〈人口問題：社會問題的鎖鑰〉，《新青年》，第 7 卷第 4 號（1920 年 3 月），頁 1-14。
- 顧孟餘，〈書藉批評〉，《新青年》，第 7 卷第 4 號（1920 年 3 月），頁 1-14。
- 顧孟餘，〈二十日歡迎蔡校長大會顧孟餘先生之歡迎詞〉，《北京大學日刊》，第 847 期（1921 年 9 月 22 日），頁 1。
- 顧孟餘，〈外資外債國家破產監督財政〉，《北京大學日刊》，第 904 期（1921 年 11 月 29 日），頁 1-3。
- 顧孟餘，〈外資外債國家破產監督財政（第二講）〉，《北京大學日刊》，第 911 期（1921 年 12 月 7 日），頁 2-3。
- 顧孟餘，〈外資外債國家破產監督財政（第二講）（續）〉，《北京大學日刊》，第 912 期（1921 年 12 月 8 日），頁 1-3。
- 顧孟餘，〈外資外債國家破產監督財政（第二講）（續）〉，《北京大學日刊》，第 913 期（1921 年 12 月 9 日），頁 2-3。
- 顧孟餘，〈外資外債國家破產監督財政（第三講）〉，《北京大學日刊》，第 921 期（1921 年 12 月 19 日），頁 2-3。
- 顧孟餘，〈體育、道德與智識階級的擔負〉，《北京大學日刊》，第 1008 期（1922 年 4 月 23 日），頁 1。
- 顧孟餘，〈錢幣理論與本位政策〉，《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922 年），頁 1-9。
- 顧孟餘講演，羅敦偉筆記，〈中國出入口商業的現狀〉，《東方雜誌》，第 19 卷第 9 期（1922 年），頁 113-120。
- 顧孟餘講演，蘇芬筆記，〈經濟生活底條件〉，《晨報副鐫》，1922 年 3 月 4、8 日，頁 1-2。
- 顧孟餘，〈體育、道德與智識階級的擔負〉，《晨報副鐫》，1922 年 4 月 26 日，頁 2。

- 顧孟餘講演，陳東原述，〈顧孟餘氏之工讀互助論〉，《晨報副鐫》，1922年11月27日，頁1-2。
- 顧孟餘，〈現代銀行信用之性質〉，《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1卷第3期（1923年），頁429-437。
- 顧孟餘，〈學術書籍之紹介與批評——Karl Helfferich, *Geld und Banken I Teil-Das Geld* 第五版〉，《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1卷第3期（1923年），頁515-517。
- 顧孟餘，〈學術書籍之紹介與批評——Robert Liefmann, *Beteiligungs-und Finanzierungsgesellschaften. Eine Studie über den modernen Effektenkapitalismus etc.* 第三版〉，《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1卷第3期（1923年），頁517-518。
- 顧孟餘，〈學術書籍之紹介與批評——Georg Friedrich Knapp, *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 第三版〉，《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1卷第3期（1923年），頁526-527。
- 顧孟餘，〈學術書籍之紹介與批評——Edwin R.A. Seligman, *[The] Shifting and Incidence of Taxation* 第四版〉，《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1卷第3期（1923年），頁525-526。
- 顧孟餘講演，吳祥麟記，〈紀事——顧夢漁先生在政治學會的談話〉，《北京大學日刊》，第1351期（1923年11月28日），頁111。
- 顧孟餘，〈學術書籍之紹介與批評——幾種近年出版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著作〉，《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2卷第3期（1924年），頁433-440。
- 顧孟餘，〈蘇俄的政治航線與中國國民黨的政治航線〉，《中央日報》，漢口，1927年7月，版次不詳。
- 顧孟餘，〈國民黨必須有階級基礎嗎？〉，《前進》，第1卷第3期（1928年7月），頁6-12。
- 公孫愈之，〈我們對於第五次會議最小限度的要求〉，《前進》，第1卷第3期（1928年7月），頁1-6。
- 公孫愈之，〈中國農民問題（未完）〉，《前進》，第1卷第4期（1928年7月），頁1-11。
- 公孫愈之，〈為第五次會議再進一言〉，《前進》，第1卷第5期（1928年8月），頁1-9。
- 公孫愈之，〈中國農民問題（下）（續第四號）〉，《前進》，第1卷第6期（1928年8月），頁1-11。

- 顧孟餘，〈國際形勢〉，《前進》，第 1 卷第 6 期（1928 年 8 月），頁 1-7。
- 公孫愈之，〈關於階級問題的幾件事實〉，《前進》，第 1 卷第 9 期（1928 年 9 月），頁 1-13。
- 公孫愈之，〈答覆中國無政府主義的革命週報〉，《前進》，第 1 卷第 10 期（1928 年 12 月），頁 1-4。
- 公孫愈之，〈社會階級論中的幾個根本問題（未完）〉，《前進》，第 1 卷第 10 期（1928 年 12 月），頁 1-10。
- 公孫愈之，〈社會階級論中的幾個根本問題〉，《前進》，第 1 卷第 11 期（1929 年 1 月），頁 1-7。
- 顧孟餘，〈論唯物史觀〉，《革命戰線》，第 8 期（1930 年），頁 58-63。
- 顧孟餘，〈關於階級問題之最後一言〉，《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香港：南華日報社，1930 年），頁 155-162。
- 公孫愈之，〈革命者今日應有的信念〉，《民友》，第 1 卷第 5 期（1931 年），頁 5-6。
- 顧孟餘，〈革命者今日應有的信念〉，《南華評論》，第 1 卷第 3 期（1931 年），頁 2-4。
- 顧孟餘，〈理論之厄運與中國人之厄運〉，《南華評論》，第 1 卷第 4 期（1931 年），頁 9-11。
- 顧孟餘，〈革命者之內省〉，《南華評論》，第 1 卷第 7 期（1931 年），頁 7-9。
- 顧孟餘，〈關於階級問題的幾件事實〉，《南華評論》，第 1 卷第 15 期（1931 年），頁 7-14。
- 顧孟餘，〈中國現在的鐵路——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在總理陵園歡送學術專家席上演講〉，《中央週報》，第 215 期（1932 年），頁 4-5。
- 顧孟餘，〈資本主義與中國經濟之路〉，《華僑週報》，第 25 期（1933 年），頁 29-31。亦刊於《當代黨國名人講演錄》，經濟篇（出版地不詳：軍事新聞社，1934 年），頁 1-8。（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82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 年）
- 顧孟餘，〈追悼蔡子民先生特輯——憶蔡子民先生〉，《東方雜誌》，第 37 卷第 8 期（1940 年 4 月），頁 63-64。
- 顧孟餘，〈蔡子民先生謝世六週紀念特輯（上）：憶蔡子民先生〉，《龍鳳》，第 1 期（1945 年），頁 69。

二、編著書籍

公孫愈之編著，《中國農民及耕地問題（前進文選之一）》。上海：復旦書店，1929年。

公孫愈之編著，《革命的真理（前進文選之二）》。上海：復旦書店，1930年。

徵引書目

一、檔案

- 《王世杰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往來函電〉。
- 《朱家驊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人才人事〉。
- 《汪兆銘史料》（臺北，國史館藏）
〈汪兆銘投敵前與政府首要函電（一）〉。
〈汪兆銘與中國國民黨有關之各項函電（一）〉。
〈汪兆銘投敵前與政府首要函電（二）〉。
〈汪兆銘組偽政府時各方函電〉。
〈汪兆銘與汪政府各省市長函電（一）〉。
〈抗戰前汪兆銘與各方首要函電〉。
〈國際各方有關方面致汪精衛函電〉。
- 《胡適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藏）
〈北京檔〉。
〈南港檔〉。
- 《國民政府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汪兆銘叛國（一）〉。

二、日記

- 《蔣介石日記》（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1927、1929、1931、1932、1935、1943、1951 年。
- 《譚延闓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1958、1960、1963 年。
- 王子壯，《王子壯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年。
-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2012 年。

周佛海著，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全編》，上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 年。

胡適著，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集》，第 3、6、8、9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 年。

郭廷以，《郭量宇日記殘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年。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45》，上、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年。

顧頤剛，《顧頤剛日記》，第 5 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 年。

三、史料彙編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第 3 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 16 卷 總第 45-47 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 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政人物下》，第 20 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年。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年。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 1 冊。臺北：國史館，2003 年。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 20 冊。臺北：國史館，2005 年。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 34 冊。臺北：國史館，2009 年。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 40 冊。臺北：國史館，2010 年。

先導出版社編，《監察院彈劾顧孟餘案始末記》。出版地不詳：先導出版社，出版時間不詳。（本書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

吳淑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 6 冊。臺北：國史館，2003 年。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 2-4、6 冊。臺北：國史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14 年。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 28 冊。臺北：國史館，2007 年。

查建瑜編，《國民黨改組派資料選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

胡頌平編，《朱家驊年譜》。臺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69 年。

胡適著，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 2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年。

秦孝儀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 1 卷。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68 年。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 26 冊。臺北：國史館，2006 年。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 39 冊。臺北：國史館，2009 年。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 54 冊。臺北：國史館，2011 年。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 75 冊。臺北：國史館，2013 年。

《陶希聖年表初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

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 17 輯。臺北：國史館，1998 年。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 1、4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 年。

善後會議秘書廳編，《善後會議公報》。臺北：文海出版社，1978 年。

程玉凰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 72 冊。臺北：國史館，2013 年。

葉惠芬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 46 冊。臺北：國史館，2010 年。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 年。

蕭李居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 43 冊。臺北：國史館，2010 年。

薛月順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 44 冊。臺北：國史館，2010 年。

四、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 2 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 年。

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年。

沈雲龍、張朋園訪問，林能士記錄，《關德懋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年。

沈雲龍訪問，林能士、藍旭男記錄，《凌鴻勛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年。

-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臺北：遠流出版社，2011年。
-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第7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年。
- 高宗武著，陶恒生譯，《高宗武回憶錄》。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
- 張朋園等訪問，陳三井、陳存恭記錄，《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
- 張發奎口述，鄭義譯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
- 張河田，《追憶集》。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79年。
- 黃旭初，《黃旭初回憶錄：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的離合》。臺北：獨立作家，2015年。
- 張友仁，《張友仁回憶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年。

五、公報、雜誌、報紙

- 《三民週刊》，重慶，1939年。
- 《大公報》，天津，1925年。
- 《中央日報》，南京，1932-1969年。
- 《天文臺半週評論》，香港，1937年。
- 《文飯》，上海，1946年。
- 《北京大學日刊》，北京，1921-1924年。
- 《申報》，上海，1925-1940年。
- 《交通雜誌》，南京，1933年。
- 《好文章》，上海，1948年。
- 《快活林》，北京，1946年。
- 《良友畫報》，上海，1926年。
- 《東方雜誌》，上海，1924-1948年。
- 《社會日報》，上海，1931-1936年。
- 《前進》，北京，1928年。
- 《革命評論》，上海，1928年。
- 《時局觀察》，上海，1939年。
- 《國民公報》，重慶，1945年。

- 《國民政府公報》，南京，1929 年。
《國聞週報》，天津，1936 年。
《教育通訊》，漢口，1941 年。
《教育部公報》，上海，1943 年。
《晨報》，北京，1925 年。
《通問報：耶穌教家庭新聞》，上海，1930 年。
《晶報》，上海，1936-1938 年。
《傳記文學》，臺北，1972-1978 年。
《新聞雜誌》，南京，1949 年。
《圖畫時報》，上海，1925 年。
《福爾摩斯》，上海，1932-1937 年。
《觀察》，上海，1948 年。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1939.
North China Herald (《北華捷報》)，Shanghai, 1940.

六、專書

- 山田辰雄，《中国国民党左派の研究》。東京：慶応通信，1980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7 年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
江勇振，《捨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 年。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 年。
呂芳上策劃、導讀，《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1 年。
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年。
李金銓編，《自由的理解與實踐——民國時期知識分子與報刊》。臺北：政大出版社，2008 年。
李金銓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年。
李珂，《陳公博》。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年。
李戡，《國民黨員毛澤東》。臺北：李敖出版社，2014 年。
陳公博著，汪瑞炯、李鏐、趙令揚編著，《苦笑錄》。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

心，1979年。

周利生，《吳廷康與中國大革命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邵建，《瞧，這人：日記、書信、年譜中的胡適（1891-1927）》。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國史館，《國史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五屆討論會》，第2冊。臺北：國史館，1999年。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年。

許小青，《誠樸雄偉——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2年。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1冊。臺北：國際關係研究所，1969年。

陳正茂，《逝去的虹影：現代人物述評》。臺北：秀威資訊，2011年。

陶英惠，《典型在夙昔：追懷中央研究院六位已故院長（上）》。臺北：秀威資訊，2007年。

程思遠，《政壇秘辛》。香港：南粵出版社，1986年。

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型塑——領袖的淬鍊》，第1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

黃美真編，《偽廷幽影錄——對汪政權的回憶》。上海：東方出版社，2010年。

鄭義編著，《國共香江諜戰》。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年。

Bunker, Gerald E. *The Peace Conspiracy: Wang Jing-wei and the China War, 1937-194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So, Wai-chor. *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1924-1931*.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七、期刊論文

吳克輝，〈北伐時期「迎汪」事件探究〉，《理論界》，2011年第6期（2011年6月）。

林博文，〈一九四九年後的香港第三勢力〉，《亞洲週刊》，第24卷第2期（2010年1月）。

段智峰，〈蔣汪合作格局下的另一種局面——以1934年顧案為中心〉，《民國檔案》，2011年第1期（2011年4月）。

張順良，〈析論國民黨改組派的由來、起迄時間與綱領〉，《正修通識教育學報》，

第 2 期（2005 年 6 月）。

張順良，〈論國民黨中央如何取締改組派的言論及其報刊（1928-1930）〉，《正修學報》，第 20 期（2007 年 11 月）。

劉小清、陳悅，〈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民國春秋》，1997 年第 6 期（1997 年 11 月）。

劉云虹，〈從顧孟餘案看監察院的彈劾制度〉，《民國檔案》，2010 年第 4 期（2010 年 12 月）。

劉維開，〈訓政前期的黨政關係（1928-1937）：以中央政治會議為中心的探討〉，《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24 期（2005 年 11 月）。

樊洪業，〈中央研究院院長的任命與選舉〉，《中國科技史料》，第 11 卷第 4 期（1990 年 12 月）。

蔣寶麟，〈抗戰時期的國家與大學政治文化：中央大學「易長」研究〉，《史林》，2009 年 3 期（2009 年 6 月）。

八、學位論文

丘文豪，〈梁啟超的政治面向〉。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3 年。